

中國的一日，一日的中國—— 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敘事與國族想像

沈松僑*

學界研究國族與國族主義，一般都會把焦點放在戰爭、革命或群眾運動等重大歷史事件上，探究兩者之間彼此激盪、相互影響的複雜過程，而很少注意到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在「國族」此一想像共同體的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一如 Michael Billig 所謂「平庸的國族主義」所指出的，國族主義其實早已廣泛地滲透進我們日常生活中習慣性的言行舉止，在習焉不察的情境下，形塑了我們對自身及社會世界的認知與理解。國族認同乃是使得社會大眾日常生活所以可能的基本形式；同時，也只有國族成員日常的言談與行動中，國族才能不斷地更新與再生。

1930年代，中國面臨內外交迫的深重國族危機，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樣態，因而也成為各類知識權威進行凝視、論述與教化等文化實踐的目標；更成為各種意識形態迥異、利益與立場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從事政治動員來形塑特定國族認同的重要場域。1936年，一批上海左翼知識分子便曾透過全國徵文的方式，編輯出版了《中國的一日》一書。該書收錄了數百篇無名大眾對自身在當年5月21日一天內的生活經驗與所思所感的敘事。本文便是以這批文本為主要討論對象，探析其所以出現的歷史條件、其所運用的敘事策略，以及這套策略所建構出的國族想像。藉由本文粗淺的討論，冀望能對近代中國國族想像與日常生活的複雜關係，提供一些初步的看法。

關鍵詞：國族想像 日常生活敘事 1930年代 中國的一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研究國族與國族主義的學者，通常都會把焦點放在諸如戰爭、革命或群眾運動等重大歷史事件上，探究兩者之間彼此激盪、相互影響的複雜關係，而很少注意到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在「國族」此一想像共同體的建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¹一如瑞典人類學者 Orvar Löfgren 所言：國族如何經由國族成員日常生活的踐行，而不斷重新被肯定的問題，在關於國族之文化建構的研究領域中，一向乏人問津。²

所以如此，當然和日常生活本身的特殊性質密切相關。所謂「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daily life)，³是一項相當模糊含混的概念，既沒有固

¹ 例見 Hans J.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² Orvar Löfgren, "The Nationalization of Culture," *Ethnologia Europaea*, 19 (1989), p. 22.

³ 在中文的語境裏，everyday life 與 daily life 都可以翻譯為「日常生活」，但是在西方社會理論與文化理論的知識脈絡中，卻指涉著兩個迥然不同的概念。二十世紀西方學界研究「日常生活」的重要思想家如 Georg Simmel, Walter Benjamin, Henri Lefebvre, Agnes Heller 與 Michel de Certeau 等人所關懷的，其實是與資本主義現代性糾結併生的 everyday life。這種「日常生活」是一種歷史性的概念，其所指涉的，乃是近代西方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出現與擴張，社會歷經急遽變遷，對時間與空間的認知也發生本質性的變化後，人類實際生活的特殊經驗。因而，這種 everyday life 截然有別於前近代由農業經濟所形塑出的 daily life；此一「日常生活」的地理場景，當然也侷限於商品消費最為活躍的都會型大都市，而與農村地區無關。因此，Ben Highmore 主張，everyday life 一詞應該用來特指現代性情境中的生活文化，而不能當作一個可以跨越歷史差異，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範疇。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討論資本主義現代化高度滯後的近代中國，或許應該對這一概念的侷限與不足，審慎地抱持著警惕與批判的態度。緣此，本文所論 1930 年代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基本上仍

定不變的內涵，也缺乏明確的界線。一般而言，日常生活指的是我們在生活中一再重複的行為、反覆經歷的旅程，以及我們最常佔居的空間；它總是被忽略的、不顯眼的、不突出的。⁴換言之，它是一個「雜亂」、「不純淨」的領域，是「習慣、欲望與機遇的湊合體」。⁵也正由於日常生活所具的複雜性與曖昧性，自難納入學院知識嚴格的分類體系，成為專業知識生產者研究討論的對象。此所以在日常生活研究領域最具貢獻的法國理論家 Henri Lefebvre，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項殘餘物，「它是被所有那些獨特的、高級的、專業化的結構性活動挑選出來用於分析之後，所剩下的『雞零狗碎』」。⁶

是以常識性的理解來運用此項概念，籠統地指稱當時社會大眾一般的生活樣貌，亦即其食衣住行諸層面的生活經驗中，那些例行性、重複性、平淡無奇、瑣碎細微，缺乏重大意義，難以有系統地全面掌握的行為與活動，而不盡遵循西方學界對 everyday life 的嚴格定義。關於 everyday life 的特定意涵，可以參見 Harry Harootunian, *History's Disquiet: Mod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9, 54-55, 64-65. Ben Highmore 的看法，見 Ben Highmore, "Introduction: Questioning everyday life," in Ben Highmore ed., *The Everyday Life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33, n.1. 此外，連玲玲在討論當前學界應用「日常生活」來進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情況時，便已指出此一概念的限制與困難，見連玲玲，〈典範抑或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新史學》，17：4（臺北，2006.12），頁 255-282，特別是頁 278-281。

⁴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1.

⁵ Alice Kaplan and Kristian Ross, "Introduction," *Yale French Studies*, 73 (1987), pp. 1-4; 亦收於 Ben Highmore ed., *The Everyday Life Reader*, pp. 76-79.

⁶ Henri Lefebvre, trans. by John Moo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I: Introduction* (London: Verso, 1991), p. 97. 中譯文見劉懷玉，〈現代性的平庸與神奇——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哲學的文本學解讀〉（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頁 103。

雖然，近三十年間，隨著知識風尚的急遽轉變，「日常生活」逐漸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要課題。⁷學者對國族與國族主義的研究取向，也相應出現了明顯的調整。1989年，Löfgren已呼籲學者應該更加注意國族文化認同與日常生活的密切相關性。他指出，國族的文化認同只能在日常生活的場域中不斷被生產與再生產；瑞典人之所以成為瑞典人，便是經由觀賞奧運的電視轉播、家族聚會時的搖旗吶喊與假日遊覽名勝古蹟等日常生活經驗的涓滴細流所凝聚而成。因而，國族計畫(national project)不能只靠意識形態的建構來維持，而必須轉化為國族成員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踐行。⁸1995年，社會心理學者 Michael Billig也提出「平庸的國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的概念，進一步闡述國族認同與日常生活的交互作用。Billig強調，國族主義並不是平時蟄伏隱沒，只在戰爭、革命、群眾運動與國家慶典等重大場合中，才昂揚出場，激盪出一幕幕火血交織、充斥著聲音與憤怒的歷史戲劇；反之，國族認同其實早已廣泛地滲透進我們日常生活中習慣性的言行舉止，在習焉不察的情境下，形塑了我們對自身及社會世界的認知與理解。國族為我們日常的政治論述、文化生產，以至平日所閱讀報紙

⁷ 以歷史學而言，1970年代以降，西方便已出現「日常生活史學」此一新興史學流派，其較具代表性的兩個學術群體，一為德國的 *Alltagsgeschichte* (日常生活史)，一為義大利的 *microstoria* (微觀史學)。近年來，中國近代史學界受此影響，也掀起一股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熱潮。關於西方日常生活史學的發展，參見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1-117; 並可參見 Gregory 的批判性評論文章，Brad S. Gregory, "Is Small Beautiful? Micro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History and Theory*, 38:1 (1999), pp. 100-110. 關於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成果及其問題，參見連玲玲，〈典範抑或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

⁸ Orvar Löfgren, "The Nationalization of Culture," p. 23.

的編排形式，都提供了一套持續性的背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談論的「新聞」、所理解的「天氣」，通常也都預設著一套國族主義的框架。換言之，即便在日常生活最細微隱蔽之處，「國族」的概念依然像一面旗幟一樣，不停地被揮舞，不斷地召喚出特定的主體認同。因而，國族認同乃是使得日常生活所以可能的基本形式；同時，也只有在國族成員日常的言談與行動中，國族才能不斷地更新與再生。⁹

Löfgren 與 Billig 討論的對象，主要是西歐與北美地區那些國族建構起步較早、基礎相對鞏固的國家。他們的看法未必完全適用於困處於國族打造之艱苦歷程的近代中國。不過，他們所提供的研究路向，或許有助於我們從一個經常被忽略的視角，重新省視近代中國國族想像複雜而幽微的面貌。

其實，正如黑格爾所言，密勒瓦的貓頭鷹總是在暮色低垂時，才振翅飛翔。理性認知的斷裂，並不表示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在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實際歷史過程中，未曾扮演過重要角色。相反的，自晚清少數精英知識分子着手推動中國的國族想像工程伊始，國族成員的生活樣貌，便一直是國族主義者審視、議論與試圖改造的對象。二十世紀初期嚴復、梁啟超等人所揭櫫的國民改造論述，固已引發此一端緒；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陳獨秀、胡適、魯迅諸人對中國社會「禮教吃人」的傳統生活方式及其「貧、病、愚、貪、亂」的現實狀態，更是口誅筆伐，不遺餘力。¹⁰中國社會中個人的日常生活，從而也在這套意識形態化的論述宰制下，與救亡富強的國族計畫緊密掛鉤，遭

⁹ 關於 banal nationalism 的詳細討論，見 Michael Billig,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1995); 並可參見 Stephen Reicher and Nick Hopkins, *Self and Nation* (London: Sage, 2001), pp. 44-45, 222.

¹⁰ 黃金麟，〈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臺灣社會研究》，30(臺北，1998.6)，頁 166-167。

到了高度政治化的命運。

等到 1930 年代，外患日亟，中國面臨存亡絕續的深重國族危機，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更進一步被問題化，成為各種政治勢力競相攘奪，進行政治動員，開展各類對抗性國族計畫的場域。1934 年，南京國民黨政權發動範圍廣及全國的「新生活運動」，試圖把一般民眾食衣住行的各項生活慣行全面納入國家權力教化與規訓的範圍，凝聚成一個以威權國家為中心的國族共同體，便是一個眾所熟知的例證。

本文擬討論的主要對象——1936 年出版的《中國的一日》一書，也是同一歷史背景的產物。這部由上海左翼知識分子透過全國性徵文的方式編輯成書的文本，彙集了數百篇無名大眾對自身於當年 5 月 21 日一天內的生活經驗與見聞的敘事，為 1930 年代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樣貌留下一部檔案式的紀錄，也為近代中國社會史與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史料。¹¹

然而，如同研究日常生活的學者所一再強調者，任何日常生活的敘事並不僅僅是反映社會「真實」的中性文本，而毋寧更是特定社會認同與權力關係借以確立、再生產，並相互競爭、協商(negotiate)的場域。¹²因而，本文並不打算根據《中國的一日》所再現的日常生活現象，對 1930 年代的中國社會狀況進行實證性的重構，而是將其置入

¹¹ 1983 年美國學者 Sherman Cochran 等人將《中國的一日》選譯出版，即著眼於其史料價值，見 Translated,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Sherman Cochran and Andrew C. K. Hsieh with Janis Cochran, *One Day in China: May 21, 193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¹² Allan Luke, Jennifer O'Brien and Barbara Comber, "Making community texts objects of study," *Australia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17:2 (1994), p. 140; cited from Dorothy Sheridan, Brian Street and David Bloome, *Writing Ourselves: Mass-Observation and Literacy Practices* (Cresskill,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2000), p. 237.

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大脈絡，探究其所以出現的歷史條件、其所運用的敘事策略，以及這套策略所建構出的特定國族認同。藉由本文粗淺的討論，冀望能對近代中國國族想像與日常生活的複雜關係，提供一些初步的看法。

二、大眾觀察在中國——《中國的一日》的編輯與出版

1936年5月18日，上海《申報》刊登了一則由「文學社」¹³與「《中國的一日》編委會」共同具名的徵稿啟事，要求「全國的作家、非作家」將個人在5月21日這一天「所經歷、所見的職業範圍或非職業範圍內的一切大小事故」照實寫出，投寄上海生活書店轉交「《中國的一日》編委會」，彙集成書，藉以「表現一天之內的中國的全般面目」。¹⁴

在1930年代，由期刊或出版社訂定主題，主動向讀者徵求文稿的事例，並不罕見，《中國的一日》的編輯構想，自非創新之舉。前此數年的1932年11月，上海《東方雜誌》曾以「新年的夢想」為題，向「全國各界知名人物」發出徵稿函，請對方就「夢想中的未來中國」與「個人生活中的夢想」兩方面，撰寫短文，¹⁵便是一個哄傳一時、

¹³ 《文學》月刊為一大型新文學雜誌，1933年7月創刊於上海，由著名作家茅盾、鄭振鐸主持，傅東華主編，生活書店發行，撰稿者多屬「左翼作家聯盟」（左聯）成員，為1930年代左派文學的重要根據地，後於1937年11月終刊。

¹⁴ 《申報》（上海），1936年5月18日；同一廣告並刊載於《永生》週刊（上海），1：9（1936年5月2日）。

¹⁵ 〈編者、作者與讀者〉，《東方雜誌》（上海），29：6（1932年11月16日），頁44-45。此次徵稿結果刊載於《東方雜誌》，30：1（1933年1月1日），「新年特輯」。1934年底，該刊又擬定「生活之一頁」一題，再度邀集百餘位各界知名人士撰稿，刊於《東方雜誌》，32：1（1935年1月1日），

極受矚目的類似活動。

不過，《中國的一日》無論在徵稿主題或邀稿對象上，都與之前《東方雜誌》的作法有著顯著的差異。《東方雜誌》所強調的，乃是對國族群體與個人未來遠景渺茫的夢想與憧憬；其徵稿方式，主要是向社會各界具有相當聲望的知名人士個別函邀，只有一小部分稿件出自主動應徵的雜誌讀者。因而，這批文稿所反映的，其實只是極少數聚居城市地區的上層知識階層的關懷。¹⁶而《中國的一日》所關注的，則是中國社會大眾當下的現實生活面貌；其徵稿對象並無任何身分、地位與職業的限制，而主動響應此一活動的三千多名投稿者，也是以學生、中小學教師、小商人、工人為主力(詳見下文)。就此而言，《中國的一日》編輯計畫所開展出的，在性質上，並不僅僅是一樁以「報告文學」為主軸的文學活動，¹⁷同時也可說是一場類似於稍後出現於

「生活之一頁特輯」。1998年，大陸學者劉仰東將此兩次徵文結果彙集成書，見劉仰東編，《夢想的中國》(北京：西苑出版社，1998)。

¹⁶ 《東方雜誌》的編輯曾對該次徵稿的結果進行過詳細分析，指出：在應徵撰文的142人中，來自上海、南京與北平三大都會的，便分別佔了78、17與12人，「而從江浙以外內地各省寄來的，更寥若晨星」；在職業的區分上，這些作者以「中等階級的自由職業者為最多」，所佔比例高達90%，其中，更以大學教授、編輯、作家、新聞記者與教育家等「文化貴族」為最大宗，約佔總人數的75%，至於廣大的農民、工人與商店職員則完全未見有撰稿者。至於年齡的分佈上，也以35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居絕大多數；在性別方面，女性投稿人更只有點綴性的4人。可見這次徵文活動確實只片面地反映了城市中產階級男性知識分子的心聲。見記者，〈讀後感〉，《東方雜誌》，30：1，頁特79-81。

¹⁷ 主編《中國的一日》的茅盾便認為該書裏大多數的文章，都屬於「報告文學」的範疇；此後的相關論述，也大都將《中國的一日》定位為「集體寫作的大型報告文學集」。參見茅盾，〈關於「報告文學」〉，《中流半月刊》，1：11(上海，1937年2月10日)，頁623；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卷上(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4)，頁293-294；張春寧，《中國報

英國的「大眾觀察」(Mass-Observation)，以傳達「人民的聲音」為標榜的社會與文化運動。¹⁸

如果把 1930 年代初期與中期這兩次徵文當作檢測的指標，我們或許可以肯定地指出：到 1930 年代中期，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文化知識界，在社會認知的視野上確已發生急遽的變化。數量龐大的中下階層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從以往備受忽視的邊緣性位置，轉而成為眾所注目、亟待認識與論述的重要對象。

何以會有這樣的變化？這與當時中國所處的歷史情境，無疑有著

告文學史稿》(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頁 133-137。

¹⁸ 「大眾觀察」(Mass-Observation)，是由 Charles Madge(1912-1996)、Humphrey Jennings (1907-1950)、Tom Harrison(1911-1976)等一群左派知識分子在 1936 年底至 1937 年初所醞釀發動的一項社會調查計畫。他們透過報章雜誌在英國全國城鄉各地招募了近千名志願者，對自身的生活經驗與見聞，進行詳盡的觀察與紀錄，試圖藉此傳達出被官方論述及主流媒體所忽略、遮蔽的「人民的聲音」。自 1937 年 2 月始，這些主要由煤礦工人、工廠勞工等勞動階層與售貨員、家庭主婦、護士、銀行職員、教師與學生等中下階層(lower middle class)組成的「觀察員」，被要求於每月的 12 日寫下當天個人生活的經歷與感想，寄交位於倫敦的大眾觀察組織總部。1937 年，Jennings 與 Madge 兩人並曾就是年 5 月 12 日(英王喬治六世於是日舉行加冕典禮)的相關材料，編選出版了 *May The Twelfth: Mass-Observation Day-Surveys 1937*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7; reprinted edition, 1987) 一書。這項計畫於 1950 年代初期中止，至 1970 年，Tom Harrison 將相關檔案移送 Sussex 大學典藏，並開放供學者從事研究。1981 年後，Mass-Observation 的調查活動重新展開，迄今陸續又有超過 2,800 名的「通訊員」參與過此項活動。該組織的簡史，可見 Dorothy Sheridan, Brian Street, and David Bloome, *Writing Ourselves: Mass-Observation and Literacy Practices*, pp. 21-78; Nick Hubble, *Mass-Observation and Everyday Life: Culture, History, Theory*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4-10;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p. 75-77. Mass Observation Archive 的網頁，見 <http://www.massobs.org.uk>.

密切的關聯。

大體而論，只有在革命與戰亂的激烈動盪時刻，一向平淡無奇、不足掛懷的日常生活，才會向歷史開放，成為必須加以辨識、爭議的問題。¹⁹1930年代中期的英國，外則法西斯勢力猖獗，戰爭陰霾籠罩全歐，內則英王愛德華八世(Edward VIII, 即溫莎公爵)被迫退位，王政體制的正當性基礎嚴重動搖，「大眾觀察」便是在此震撼危疑的關鍵時刻應運而起。²⁰同樣的，同一時期中國所處的，也正是一個大眾的日常生活瀕臨絕境的危機時代。一方面，這個時期的中國正面臨著外力的深重威脅：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全面淪喪以還，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侵略步調日益加遽，至三十年代中期，華北半壁已名存實亡、斷送殆盡，中國前途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北伐之後，中國的內部統一工作並未真正完成，各地實力派的軍事集團依然據地稱雄，與南京國民黨政權相抗衡；而中共的長期軍事革命活動，更構成國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政治混亂之餘，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也迭遭摧殘，處於風雨飄搖、阡隍不安的局面。在世界性經濟大蕭條的衝擊下，城市工商產業發展停滯，廣大農村又連年遭逢水旱、饑饉與瘟疫的侵襲，陷入全面破產的困境。一般社會大眾既面臨著山河破碎、國難當頭的群體危機，個人生活也直接蒙受失業、失學的切身威脅。因而舉國上下莫不瀰漫著一股陰鬱不安與徬徨苦悶的氣氛。特別是當時人數日增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更普遍因為現實生活中各方面的挫折，惶惑憤懣，不知所從。一位在五卅期間積極投身婦女解放運動的女性知識分子，在1930年代中期便已完全喪失了往昔的樂觀與憧憬，轉而悲嘆道：「近幾年來，整個社會的不安，使我個人的生活也陷於

¹⁹ Maurice Blanchot, trans. by Susan Hanson, "Everyday Speech," *Yale French Studies*, 73 (1987), p. 12.

²⁰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p. 29, 75.

艱難與苦痛之中了。」²¹ 另一名上海的「文藝青年」也不時感到「心情的茫然悸動」，迷惘擺盪於「亡國的悲哀」與「生之困惱、病的倦怠」之間。²²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與心理狀態下，如何針對中國社會大眾的生活樣貌提出一套完整的敘事，有效解釋其所以陷入絕境的癥結禍源，指出可能的出路與努力方向，自然成為眾所矚目、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從而，日常生活不再只是個人私領域的隱密事物，轉而成為各類知識權威進行凝視、論述與教化等文化實踐的公共空間；更成為意識形態迥異、利益與立場截然不同的政治團體，從事政治動員、角逐文化霸權的重要場域。南京國民黨政權於三十年代中期所發動的「新生活運動」，便是這個鬥爭過程中，一場企圖以國家力量介入民眾日常生活，來形塑特定國族認同的高度政治化的社會運動。²³

1934年2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南昌行營發表〈新生活運動的要義〉的演講，旋即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正式揭開「新生活運動」的序幕。在黨、政、軍與教育系統的大力配合之下，這項運動由南昌迅速向外擴散，至1936年，全國20個省、4院轄市、1,355個縣，均相繼設立分會，旗鼓高張，聲勢極為浩大。²⁴

²¹ 陳碧雲，〈已往之片段〉，《東方雜誌》，32：1，「生活之一頁特輯」，頁特49。

²² 楚陽，〈黃昏小語〉，《申報》，1936年10月16日，「文藝專刊」。

²³ 學界對「新生活運動」的研究為數甚多，觀點互異、褒貶不一，然此並非本文關懷重點，不擬深入探究。以下的討論，主要採取黃金麟的觀點。見黃金麟，〈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頁163-203。關於海峽兩岸史學界對新生活運動研究成果的簡要介紹，可見溫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35)》（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前言」，頁1-15。

²⁴ 〈新運十年〉，收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68輯（臺北：黨史會，1975），頁208。

新生活運動的敘事策略，基本上是以一種負面的否定方式，來勾勒中國社會大眾既有的生活樣態。²⁵蔣介石把「中國普通一般人現實的生活狀況」，歸納為「污穢、浪漫、懶惰、頹唐」數端。他強調，這種生活並非人類所應當過的合理的文明生活，而是和「牛馬豬狗禽獸一樣」的野蠻生活，一種非人的「鬼生活」。²⁶

新生活運動者認為，社會大眾日常生活的良窳優劣，直接關係到國家民族的盛衰興亡。如果一般國民因循苟且，一味沉溺於現在這種「野蠻生活、鬼生活」，其結果則「不僅國家不能保存，即種族亦就要消滅」。²⁷他們更認為中國之所以面臨當前的深重危機，根本原因並非「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與「共匪的蔓延和囂張」，而端在於「人民生活的標準沒有建樹，一般人的習氣太壞」，以致「國民步伐不能整齊，生產的效率不能增進」，社會元氣受到無形損害，「民族自然不能長進」。²⁸

然則，中國民眾的生活狀況，何以墮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新生活運動者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在西方文明衝擊下，「禮義廉恥」等中國固有「國魂」的淪喪。因此，新生活運動的總體目標，便是要重新發揚傳統「國魂」，使中國民眾「都能以禮義廉恥為基本原則，改革過去一切不適用於現代生存的生活習慣，從此能真正做一個現代國民」。²⁹換言之，也就是要根據「中國固有的禮義廉恥道德的習慣」，來規範全體國民日常食衣住行的各類生活行為。³⁰

25 黃金麟，〈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頁 171-173。

26 蔣介石，〈新生活的意義和目的〉，《革命文獻》，68 輯，頁 30-32。

27 蔣介石，〈新生活的意義和目的〉，頁 32。

28 張世祿，〈新生活運動與中國民族〉，收於新生活叢書社編，《新生活運動須知》（南京：新生活叢書社，1935），頁 155。

29 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之要義〉，《革命文獻》，68 輯，頁 19。

30 蔣介石，〈新生活的意義和目的〉，頁 32。

爲了達到此項目標，新生活運動展開伊始，即擬訂頒佈〈新生活須知〉，分「規矩」與「清潔」二目，共 95 條，舉凡衣着、進食、居家、言談、行路、禮儀等各項生活細節，均有明確規定，甚至刷牙、洗臉、吐痰、便溺與撲蠅、滅鼠等日常衛生習慣，也成爲政府指導與督察的對象。³¹及 1935 年 3 月，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進一步制訂「三化」方案，鼓吹生活的「軍事化」、「生產化」與「藝術化」。在此方案之下，政府一方面積極組訓民眾、調查戶口、編練保甲，並對公務員與各級學校教職員生普遍實施軍事訓練；另一方面更對社會大眾日常生活中持躬待人、處事接物的各項細節，作出更爲嚴格而細密的規定。³²

配合這些條文規約，新生活運動總會積極動員其所掌控的各類組織與宣傳資源，除利用報紙、雜誌、電影、標語、廣告等傳播媒體大肆宣揚外，並召開市民大會、舉辦提燈遊行、邀請名人公開講演。同時，更由各省縣市新運會，會同當地黨政機關學校，組織糾察隊，配合憲警，對各地住戶、商家、機關、學校及各類公共場所、街道的清潔衛生狀況，進行嚴密的監視與檢查。在這一連串強制性的規訓之下，中國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一如上文所述，已不再是一個視而不察的潛伏領域，而成爲各方論述、爭議與試圖界定的場所，更成爲政治權力開展其教化性活動的空間。³³

就其實際成效而言，這場聲勢浩大的生活改造運動，固難謂成功。³⁴不過，從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長遠脈絡觀察，新生活運動實仍

31 〈新生活須知〉，《新生活運動須知》，頁 216-220。

32 〈新運十年〉，頁 237-240；關志鋼，《新生活運動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頁 114-120。

33 黃金麟，〈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頁 196。

34 1936 年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二週年紀念會上，便坦率指出：「我們現在

不失為其間一個重要的篇章。如論者所言，新生活運動一方面有其政治策略的考量，透過將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等敵對意識形態的「他者化」，這套特殊的生活論述，多少對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基礎提供了強化的作用。另一方面，新生活運動更承襲了晚清以來「國民」論述的國族主義思想系譜，試圖藉由對一般民眾日常生活的全面干預與改造，來塑造出一群 Michel Foucault 所謂的「溫馴的身體」(docile body)——一種既柔順而又具有生產性的身體，進而將其凝聚成一個以國民黨黨國意志為依歸的政治共同體。³⁵就此而言，新生活運動實不失為近代中國國族打造過程中，一場以「日常生活」為舞臺的國族主義「身體技藝」(technology of body)的特殊展演。

面對新生活運動鋪天蓋地的強大攻勢，政治立場傾向社會主義，與南京政權處於敵對態勢的左派知識分子，自然必須在同一戰場上，提出一套有別於官方論述的抗制性敘事形式，來競爭對大眾日常生活的解釋霸權。他們所找到的，便是一種甫由國外傳入未久的新興文學體裁——報告文學。³⁶許多中國近代文學史的研究者都指出，1930年代中期，報告文學異軍特起，風靡一時，吸引了許多文人投身其間，從事創作。³⁷當時，這種文類的作品，題材大多集中於工農大眾日常

到處都可以看到新運的標語，而很少看到新運的實效；到處都可看到推行新運的團體或機關，卻是很少看得見有多數國民確實受了新生活運動的效果。」見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二週年紀念之感想〉，《革命文獻》，68輯，頁45。

³⁵ 參見黃金麟，〈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一文的相關討論，特別是頁188-203。

³⁶ 據張春寧研究，報告文學(reportage)一詞在中國文學界正式出現於1930年，其命名與相關理論均係由國外引進。見張春寧，《中國報告文學史稿》，頁78-79。

³⁷ 例見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卷上，頁292-296；張春寧也認為1936年是中國報告文學發展史上豐收的年頭，標誌著中國報告文學的成熟；見

生活苦難的描述和社會問題的挖掘，政治色彩十分濃厚。³⁸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報告文學集」的蘆焚便明白指出：這些作品大多以政治性宣傳為寫作目的，企圖「把自己耳聞目睹人民大眾的困苦以及反抗，傳布到更遠的地方，使全國讀者都能夠知道，使全國廣大群眾都能夠聽到」。³⁹換言之，1930年代中期，在「剿匪」前線硝煙炮火的有形戰場之外，國共兩黨其實還在「日常生活」這塊無形而靜默的戰場上，進行著激烈的鬥爭。

從這樣的脈絡觀察，《中國的一日》可謂是這場文化鬥爭的一個重要環結。《中國的一日》編輯期間，正是新生活運動如火如荼、全面推展的階段，與「新生活」有關的各類符號與活動，自不免成為社會大眾日常生活的例行性的組成部分。《中國的一日》書中便有多篇文章直接、間接敘及編練壯丁、軍訓校閱、修堡築路與清潔衛生等各項新生活運動所強制規定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對新生活運動抱持著或譏諷或抨擊的否定態度。(見下文)所以如此，當然與該書編選過程中刻意的取捨選擇有關。而這種特定的再現方式，也正反映出《中國的一日》對「新生活運動」這一套來自官方的宰制性日常生活敘事的排拒與抵抗。

雖然，我們仍不應忽略直接催生這部 1930 年代中國日常生活檔案⁴⁰的個別行動者(agent)與偶然性的歷史機緣。其中，扮演著關鍵性角

張春寧，《中國報告文學史稿》，頁 139。對於這段時期報告文學最詳盡的研究成果，見王文軍，《局部抗戰時期中國報告文學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³⁸ 張春寧，《中國報告文學史稿》，頁 153。

³⁹ 蘆焚，〈序〉，《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第 13 集，「報告文學集」。

⁴⁰ 「日常生活檔案」(everyday life archive)一詞借自 Ben Highmore，見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pp. 24-26. 「檔案」的概念，

色的，便是《生活週刊》主編、生活書店創辦人，近代中國著名的「進步」報人——鄒韜奮(1895-1944)。

1926年底，鄒韜奮接辦《生活週刊》之初，還是一個傾向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溫和改良主義者。在這份以城市地區的中小學教師、學生與「職業青年」為主要對象的刊物上，鄒韜奮發表了大量討論升學、就業、婚姻、戀愛等現實生活問題的文章，極力強調個人道德、知識修養與勤奮、自助的精神對於事業成功與社會進步的重要作用。這種言論立場相當契合這群正努力向上爬升的城市小市民階層的期望，因而大受讀者歡迎，銷路也急速增加，在1929年，每期銷數已由原來的兩千多份，增長到八萬多份，成為極具影響力的重要刊物。⁴¹

然而，等到1930年代，隨著國族危機的急遽加深與社會、經濟狀況的日趨惡化，城市小知識分子迭遭現實挫敗之餘，對於個人與群體之關係的看法，逐漸發生轉變，思想也日益激進，許多「職業青年」便相繼揚棄個人主義的道德信念，蛻變成爲高度政治化的「進步青

當然出自 Michel Foucault，其所指的，並非只是文獻的蒐集與整理，而毋寧更是一種實踐，這種實踐，「使得陳述(statement)得以延續並時時刻刻地進行修正」。參見 Michel Foucault, trans. by A. M. Sheridan Smith,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1972), pp. 128-131.

⁴¹ 韜奮，《經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頁75；陳揮，《鄒韜奮——大眾文化先驅》(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頁76-77；Wen-hsin Yeh, "Progressive Journalism and Shanghai's Petty Urbanites: Zou Taofen and the Shenghuo Enterprise, 1926-1945,"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Wen-hsin Yeh eds., *Shanghai Sojourn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90-216. 《生活週刊》的銷售數，見張仲實，〈一個優秀的中國人——鄒韜奮先生的生平、其思想及事業〉，收於鄒嘉驪編，《憶韜奮》(上海：學林出版社，1985)，頁76；錢小柏、雷群明編，《韜奮與出版》(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4。

年」。⁴²作為這個階層之代言人的鄒韜奮也不例外。經過 1931 年「九一八事變」與次年「一二八淞滬事變」的重大刺激，鄒韜奮既痛感國亡無日，對南京政府一再退讓妥協的不抵抗政策尤為憤慨，言論立場遂出現重大轉折，「漸漸注意於社會的問題和政治的問題，漸漸由個人出發點而轉到集體的出發點了」。⁴³茲後，鄒韜奮一方面積極投身反日救亡運動，一方面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腐敗與現實社會體制的黑暗大肆抨擊。1935 年底，他在《大眾生活》週刊的發刊詞中，更徹底否定其以往所持的個人主義信念，將中國的唯一出路完全寄託於人民大眾反抗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的民族解放鬥爭之上。⁴⁴此後，「努力促進民族解放」與「積極推廣大眾文化」便成為鄒韜奮戮力以赴的兩大目標。⁴⁵

同一時期，鄒韜奮主持的出版事業也有極為快速的進展。《生活週刊》轉型為以抗日救亡為號召的政治性刊物後，發行數量突飛猛進，到 1930 年代初期，已達十五萬五千餘份，創下近代中國雜誌發行量的最高紀錄。⁴⁶在此基礎上，鄒韜奮進一步於 1932 年 7 月開辦生活書店，大量出版各類「進步」書刊，復於《生活週刊》⁴⁷之外，陸

42 Wen-hsin Yeh, "Progressive Journalism and Shanghai's Petty Urbanites: Zou Taofen and the Shenghuo Enterprise, 1926-1945," p. 198.

43 韜奮，《經歷》，頁 75。

44 韜奮，〈我們的燈塔（發刊詞）〉，《大眾生活》（上海），1：1（1935 年 11 月 16 日），頁 1-2。

45 〈創刊詞〉，《生活日報》（上海），1936 年 6 月 7 日。

46 錢小柏、雷群明編，《韜奮與出版》，頁 14；生活書店史稿編輯委員會編，《生活書店史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頁 22。

47 《生活週刊》於 1933 年 12 月遭南京政府查封，此後陸續改名《新生》（1934 年 2 月-1935 年 6 月）、《大眾生活》（1935 年 11 月-1936 年 2 月）、《永生》（1936 年 3 月-1936 年 6 月）、《生活日報星期增刊》（1936 年 6 月-1936 年 7 月）、《生活日報週刊》（1936 年 8 月）、《生活星期刊》（1936 年 8 月-1936

續創辦《文學》、《世界知識》、《婦女生活》、《太白》、《譯文》等期刊，一時之間聲勢頗為浩大，蔚為 1930 年代上海出版界的後起之秀。⁴⁸在這個過程中，鄒韜奮與上海的左翼知識分子、文人作家密切互動，往來頻繁。這固然使鄒韜奮的思想言論更形左傾，生活書店實際成為中共與國民黨競爭文化霸權的重要據點；⁴⁹另一方面，卻也為《中國的一日》的編輯與出版，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與經費資源。

不過，《中國的一日》的出版構想，卻非出自鄒韜奮的創意，而是受到蘇聯作家高爾基(Maxim Gorky, 1868-1936)偶然的啟發。

1934 年，高爾基在第一次全蘇作家大會上，提出一項以集體創作的方式，編寫一部描述世界一日之書籍的構想。他主張隨意選擇一個平常的日子，由各國作家輯錄當天報紙所刊載的真實事件，添註案語，然後彙編成書，以「表現現代生活紛雜麻亂的全部情景」。這項提議經過熱烈爭論後，得到與會各國作家的大力支持，但是由於規模龐鉅，需要極大的資金與嚴密的組織，不得不暫行擱置。直到次年夏天，巴黎舉辦世界作家大會，蘇聯代表重申前議，並自願擔任組織聯絡的工作，這項計畫才正式落實下來。

《世界的一日》編輯部設立後，選定 1935 年 9 月 27 日為標的，呼籲世界各國的「記者、作家、社會領袖、藝術家、學者、戲劇演員」，留意搜集當天的個人札記、報紙、攝影、戲院海報、街頭廣告，以及「一切希奇的社會的文化的和人事的文告」，投寄到位於莫斯科的編

年 12 月)，繼續出版。

⁴⁸ 錢小柏、雷群明編，《韜奮與出版》，頁 15-20；《生活書店史稿》，頁 37-41、48-59。

⁴⁹ 鄒韜奮生前並非中共黨員(死後始由中共中央追認)，不過，生活書店成立之初，即已遭中共黨人滲入，總編輯張仲實即為一例；此外，胡愈之(1896-1986)的影響尤為重大，夏衍便稱胡愈之為生活書店的「軍師」，見《生活書店史稿》，頁 17-21。

輯總部，譯為俄文，以編就一部觀察、記錄「地球上平常的一天」的檔案性文本。

高爾基發動這項計畫的消息，首先由供職於莫斯科中國大使館的翻譯家耿濟之撰文報導，刊載於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1936年初，知名左翼作家茅盾（沈雁冰，1896-1981）又在《譯文》月刊上將《世界的一日》編輯柯耳曹夫（Mikhail Kolzov）所寫的介紹性文章翻譯刊佈，引起了中國知識界廣泛的注意，也激發了鄒韜奮起而效尤的念頭。⁵⁰

鄒韜奮原本便對高爾基十分景仰，1933年7月，他曾根據英文相關著作編譯出版了《革命文豪高爾基》一書，介紹高爾基的生平。不久，鄒韜奮出遊海外，抵達莫斯科時，還特意致函高爾基，表達敬慕之意，並贈送《革命文豪高爾基》一書。⁵¹因而，當他得知《世界的一日》的編纂計畫時，甚感興奮，便打算仿倣編印一部《中國的一日》。⁵²

1936年4月，鄒韜奮找上茅盾，邀其擔任該書主編。雙方經討論後，選定是年的5月21日為主題，⁵³並決定採取包幹的辦法，生活書

⁵⁰ 以上所述，參見耿濟之，〈蘇聯文壇近聞〉，《大眾生活》，1：1，頁27-28；M. 柯耳曹夫作，茅盾譯，〈世界的一日〉，《譯文》（上海），新1：1（1936年3月），頁43-53。

⁵¹ 戈寶權，〈鄒韜奮和高爾基〉，收於鄒嘉驥編，《憶韜奮》，頁234-237。

⁵² 以下所述，大體根據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冊（香港：三聯書店，1984），頁317-323及茅盾，〈關於編輯的經過〉，《中國的一日》（上海：生活書店，1936），頁1-7的敘述，非有必要，不另加註。

⁵³ 據茅盾回憶，所以選擇5月21日，主要是因為該日平凡無奇，較能反映大眾日常生活的真貌，更可避免特定紀念日來稿內容過於雷同之弊。見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冊，頁318。最近，大陸學者李曉如曾引述該書助理編輯孔另境的說法，指出這個日期的選擇，是為紀念發生於北伐期間的「馬日事變」（1927年5月21日），見李曉如，〈《中國的一日》編輯出版探析〉，<http://www.epsalon.com/printpage.asp?ArticleID=4234>。唯此說法並無任何其他旁證支持，1969年文革期間，茅盾接受外部調查時，所持說法與其回憶錄的敘述相符，當屬可信。見茅盾，〈關於《中國的一

店只管出版與發行，所有集稿及編輯工作，統由茅盾負責。不過，為淡化該書政治色彩，避免當局的注意與干涉，除茅盾及鄒二人外，另邀王統照、沈茲九、金仲華、柳湜、陶行知、章乃器、張仲實、傅東華、錢亦石等九人，共同組成一個並無實質功能的編輯委員會。⁵⁴

據茅盾回憶，這個編輯委員會前後只開過一次會，主要任務在商定全書體例與發動投稿。由於高爾基主編的《世界的一日》遲未出版，⁵⁵自無範本可依，編委會幾經斟酌，最終決定不論文章的內容與文體，完全依省市之別分卷編排。在稿源方面，除刊登啓事廣行徵稿外，還打算透過私人關係拉稿，以補足部份必要的稿件；所有稿件，均以一千字為限，文體方面則不作任何限制。不過，後來的結果顯示，靠私人關係拉稿的成效並不理想，絕大多數的稿源，「還是靠廣大的『無

日》的補充介紹》，《茅盾全集補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頁 588-589。

⁵⁴ 茅盾指出，這些人選的擬訂，主要是從政治上考量，見茅盾，〈關於《中國的一日》的補充介紹〉，頁 588。王統照(1897-1957)為著名作家；沈茲九(1898-1989)，著名女報人，《婦女生活》主編，抗戰期間加入共產黨；金仲華(1907-1968)，「進步」報人，時任生活書店編輯主任，《世界知識》雜誌主編；柳湜(1903-1968)，中共黨員，時任《申報》編輯，並與李公樸、艾思奇共同創辦《讀書生活》半月刊；陶行知(1891-1946)，著名教育家，時任《生活教育》半月刊主編，並積極參與抗日救亡運動；章乃器(1897-1977)，時任浙江實業銀行副經理，並與馬相伯等人共同發起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為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張仲實(1903-1987)，中共黨員，時任生活書店總編輯；傅東華(1895-1971)，著名翻譯家，《文學》月刊主編；錢亦石(1889-1938)，中共黨員，著名社會學家，時任上海政法學院及暨南大學教授。

⁵⁵ 《世界的一日》(M. Gorky and M. Kolzov eds., *Den mira*)一書遲至 1937 年，才在莫斯科出版；1960 年，蘇聯出版界為紀念《世界的一日》編輯計畫二十五週年，又選定 1960 年 9 月 27 日，向全世界徵稿，以同一書名出版(Editorial Board of *Izvestiia* ed., *Den mira*, Moscow, 1960)。參見“Introduction: Two Versions of *One Day in China*,” *One Day in China: May 21, 1936*, p. xv, n. 16。

名英雄』的贊助」。

各項基本方針釐定之後，便出現了上文所引述的徵稿啓事。

這則徵文啓事在各報刊登出之後，迅即引發各界熱烈回應，應徵稿件源源不斷湧入生活書店。據茅盾統計，至6月底活動截止時，總共收到稿件三千餘篇，共約六百萬字。以地區分，全中國除新疆、青海、西康、西藏、蒙古等邊疆地區外，各省市均有來稿；以職業分，「除了僧道妓女以及『跑江湖的』等等特殊『人生』而外，沒有一個社會階層和職業『人生』不在龐大的來稿堆中佔一位置」。主持實際編輯工作的茅盾對此一出乎意料的盛況，便有過如下一段的感想：

「五月二十一」幾乎激動了國內國外所有識字的而且關心著祖國的運命的而且渴要知道在危難關頭的祖國的全般真實面目的中國人的心靈，他們來一個腦力的總動員了！⁵⁶

基於成本、售價與銷路的考慮，這些稿件當然不可能全盤收錄。經過茅盾與擔任助理編輯的妻弟孔另境兩人前後兩次仔細篩選，歷時一個多月的努力，終於選定471篇，約八十萬字的稿件。⁵⁷這將近五百篇，在形式上涵蓋了短篇小說、報告文學、小品文、日記、信札、遊記、速寫、印象記、短劇等各類文體的生活敘事文本，再加上張仲實搜集5月21日當天全國各大報所刊登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與教育、體育等方面的重大消息所編成的「全國鳥瞰」，以及孔另境所編纂的「一日間的報紙」(全國近百種報紙的提要)與「一日間的娛樂」(摘

⁵⁶ 茅盾，〈關於編輯的經過〉，頁2。

⁵⁷ 茅盾選稿的標準主要是從地區、內容、文字等方面考量，以盡量避免重複為原則，但對邊遠地區來稿極少者，則不論其內容文字如何，幾乎均予採用。見茅盾，〈關於編輯的經過〉，頁2-3。此外，茅盾說，收入《中國的一日》的文稿，達490篇左右，唯據實際計算，僅得471篇，其中有一篇為8名作者的集體創作，由6篇短文組成(見〈棗莊的一日〉，《中國的一日》，第十一編)，如此文改以6篇計，則全書應為476篇。

抄各省主要城市當日娛樂活動內容)兩編，便共同構成一部共十八編、凡 801 頁的大書——《中國的一日》，並於同年 9 月 15 日正式出版。⁵⁸

茅盾在《中國的一日》出版前，特意執筆撰寫〈關於編輯的經過〉一文，充作全書的前言。在這篇文章中，茅盾詳細說明了該書的緣起、編輯的歷程、選錄文章的標準，以及全書的大致內容。但是，面對這部卷帙浩繁、性質獨特的大書，我們仍不免產生許多難解的疑問。

首先，《中國的一日》數千位的投稿者，究竟是那些人？出自怎樣的社會階層？他們對自身生活經驗的敘述，是否足以代表當時中國社會大眾一般性的生活面貌？

茅盾曾對所有投稿者的職業分布與性別區隔，作過粗略的估計。以「社會屬性」來區分，要以學生為最大宗，約佔總人數的 34.9%，其次為中小學教員，約佔 15.5%，商人佔 9%，文字工作者佔 4.7%，工人佔 1.7%，農民佔 0.4%，其他各種自由職業、軍警人員及身分不明者共佔 33.8%；若以性別分，則為男性居絕大多數，女性投稿者僅佔總數的 4%至 5%。⁵⁹由此可見，對此一徵稿活動響應最為熱切的，還是由城市地區男性小知識分子與「職業青年」所構成的小市民階層，這與前文所述《生活週刊》讀者群的身分結構大致相符。

不過，《中國的一日》最終所收錄的近五百篇文章，是否忠實地反映出這樣的作者結構？主編者在編選的過程中，是否曾滲入個人的主觀好惡，以至扭曲了不同階層原來所佔的比重？

⁵⁸ 據 Sherman Cochran 等人統計，《中國的一日》全書 801 頁中，摘錄或概述當日報紙之內容的部分(即「全國鳥瞰」、「一日間的報紙」與「一日間的娛樂」等三編)，合計僅佔 61 頁；此外，前言、編輯說明與圖片部份共 26 頁，其餘 714 頁均為投稿者所撰寫的生活敘事。見“Introduction: Two Versions of *One Day in China*,” *One Day in China: May 21, 1936*, p. xvi, n. 17.

⁵⁹ 茅盾，〈關於編輯的經過〉，頁 5。

由於原始資料的散佚，我們無法用最初的稿件來與《中國的一日》比對覆勘，而只能根據該書各篇的內容，稍加推估。⁶⁰據本文統計，該書共收錄 480 位作者所撰寫的 471 篇文章(其中有兩篇為二位作者合撰，一篇由 8 名作者集體撰寫)。這 480 名作者中，可確定為女性者僅 16 人，性別不明者 47 人，其餘 417 人均為男性。從地域分，這些文章大多來自各大都市與沿海、沿江的中小市鎮，其中僅上海(62)、南京(23)、北平(20)、蘇州(16)、武漢(11)、廣州(10)、杭州(9)等地合計便達 151 篇，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察哈爾(6)、綏遠(3)、河南(14)、山西(15)、陝西(11)、甘肅(5)、廣西(7)、貴州(3)、雲南(7)、四川(8)等內陸省份的來稿，則總共只有 79 篇，尚不及總數的 17%。就職業身分的區劃觀察，這 480 名作者，扣除身分不明的 228 人，所餘 252 名中，學生共 63 人，佔總數的 25%；中小學教員共 64 人，也佔了 25% (其中，小學教員為 48 人，佔 19%)；商人及店職員共 27 人，佔 10.7%；工人與學徒共 15 人，佔 5.9%；公務員共 9 人，佔 3.6%；軍憲警(含軍警學校學生)共 29 人，佔 11.5%；記者編輯共 15 人，佔 5.9%；大學教授及自由職業者共 14 人，佔 5.6%；其他(含政治犯等)身分者共 13 人，佔 5.2%。易言之，在身分可以確認的作者群中，小學教員與一般中下層「職業青年」所佔的比例，明顯高過他們在三千多名投稿人中的原始比重，可見該書的編成，的確經過主編者有意識的選擇與調整。茅盾本人也坦承，該書在文稿的取舍上，比較偏好那些「向來從不寫稿」的「店員、小商人、公務員、兵士、警察、憲兵、小學教員」等人的作品；他強調，也正是由於他們的貢獻，「這本書的材料才不單調，而展示了中國一

⁶⁰ Sherman Cochran 等人曾致函茅盾，探詢未經《中國的一日》收錄出版之稿件的下落，唯直到 1981 年茅盾去世，始終不得要領。該批稿件是否尚存於世，亦不得而知。見“Introduction: Two Versions of *One Day in China*,” *One Day in China: May 21, 1936*, p. xx, n. 26.

日之多種的面目」。⁶¹

不過，這種刻意的選擇，除了出自增進全書內容的多樣性等技術性考量外，多少也與鄒韜奮及茅盾等人抱持的政治意圖，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此之前，高爾基倡議編印《世界的一日》，已帶有濃厚的政治動機，柯耳曹夫便把此項工作，當作是「全世界一致擁護蘇聯的文化發言權」的示威運動。⁶²同樣的，鄒韜奮與茅盾編印《中國的一日》，目的也在通過這種活潑的文學形式，「來反映全國各地民眾抗日的要求，與當局的不抵抗政策作一對照」，並向讀者介紹「在這國家生死存亡之時全國的黑暗面和光明面」。⁶³由是而論，《中國的一日》並不僅是一套以特殊文學形式再現中國社會「真實」面貌的文本，它同時也是特定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的產物。

那麼，這部具有濃厚政治宣傳意味的作品，究竟在當時發揮過多大的影響？它的銷售與流通狀況如何？一般社會大眾是怎樣來接受、解讀和回應這部書所試圖傳達的訊息？

由於相關資料的嚴重不足，我們無法確切回答這些重要問題。我們只知道，生活書店為促銷該書，花了不少力氣，不但訂定相當低廉的書價(硬面精裝一鉅冊，售價僅一元六角)，還在各大報刊上大做廣告，同時更推出優惠辦法，凡訂閱該書店所發行之《文學》月刊一年份，一律附贈該書一冊。⁶⁴此外，茅盾並特意為此書撰寫專文，以廣招徠；⁶⁵

⁶¹ 茅盾，〈關於編輯的經過〉，頁 6。

⁶² M. 柯耳曹夫作，茅盾譯，〈世界的一日〉，頁 52。

⁶³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冊，頁 317。

⁶⁴ 《中國的一日》的出書廣告與贈書辦法，見《申報》，1936 年 9 月 1 日、9 月 9 日、9 月 22 日；《生活日報星期增刊》(上海)，8(1936 年 7 月 26 日)；《生活星期刊》(上海)，1：14(1936 年 9 月 6 日)、1：16(1936 年 9 月 20 日)、1：17(1936 年 9 月 27 日)；《婦女生活》(上海)，3：8(1936 年 11 月 1 日)。

上海的左翼刊物也先後刊出數篇評介文章，作桴鼓之應。⁶⁶不過，這些相關活動到底收到多少實際效果，我們仍是不得而知。

比較可以確定的是，《中國的一日》出版之後，迅即成為同類作品爭相模仿的圭臬，甚至被譽為此後諸多「一日型」出版物的「父本和母本」，「持續影響著中國文化界」。⁶⁷1936年，陝北蘇區的「中國文藝協會」即曾發布徵文啟事，決定以1937年2月1日為標的，仿照《中國的一日》，編輯《蘇區的一日》，以「全面表現蘇區的生活和鬥爭」。⁶⁸1938年春，上海華美報館為紀念抗戰一週年，也以《中國的一日》為師法的對象，公開徵文，編成一部432篇、共約一百萬字的《上海一日》。⁶⁹1941年春，中共晉冀察邊區所轄冀中地區的黨政軍領導程子華等人，又擇定當年的5月27日，號召當地群眾與幹部、士兵，以個人是日的生活與戰鬥為範圍，執筆寫作。最後選錄了二百餘篇，編為《冀中一日》一書，分作四輯，陸續印行。⁷⁰至於其

⁶⁵ 茅盾，〈被考問了《中國的一日》〉，《生活星期刊》，1：18（1936年10月4日），頁207、213。

⁶⁶ 據筆者所知，計有徐懋庸，〈「中國的一日」(生活話題)〉，《生活知識》(上海)，2：9（1936年9月20日）；梅雨，〈《中國的一日》(書評)〉，《通俗文化》(上海)，4：6（1936年9月30日）；(黎)烈文，〈介紹《中國的一日》〉，《中流》半月刊(上海)，1：3（1936年10月5日），頁159-160。

⁶⁷ 李曉如，〈《中國的一日》編輯出版探析〉。

⁶⁸ 張春寧，《中國報告文學史稿》，頁78-79。該書後來並未編印完成，僅有部分作品發表於《蘇區文藝》及陝北各報刊上。

⁶⁹ 朱作同、梅益主編，《上海一日》(上海：華美出版公司，1938)。該書主編梅益為上海中共地下組織「文化工作委員會」的成員，這部書並未指定固定的一天為描述主題，只要是抗戰一年間任何一日均可，因而與《中國的一日》編輯方式略有出入。見張春寧，《中國報告文學史稿》，頁180-182。

⁷⁰ 張春寧，《中國報告文學史稿》，頁220-222。不過，該書最初僅石印或油印了200部，旋即散佚，直到1959至1963年間始先後正式出版。該書部分內容可參見中國報告文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報告文學叢書》，

他較不知名的類似徵文活動，更是所在多有，⁷¹充分顯示了《中國的一日》長遠而廣泛的影響力量。

因而，學者將《中國的一日》稱作是「中國報告文學史上的一個壯舉，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⁷²洵非過譽之辭。不過，這當然已不是本文所能討論的問題了。

三、空間、時間、「他者」——日常生活敘事與國族認同

從事日常生活研究的文化理論家，都難以規避一項兼具理論與實踐意涵的重大問題。Ben Highmore 在討論英國的「大眾觀察」運動時，便指出，川流不息、無休無止，乃是日常生活的最大特質，因而任何試圖捕捉、理解、審視日常生活的努力，往往都是勞而無功；我們也很難找到一種貼切的論述形式，來適切地再現日常生活。然則，面對「大眾觀察」所生產出的大量日常生活檔案，我們如何才能有效地運用？如果這批檔案本已充斥著日常生活多元而嘈雜的聲音，我們又怎樣才能將其編織成一些有意義的主題，敷演出一套完整可讀的敘事？⁷³

這個問題，也正是茅盾在編纂《中國的一日》時，所遇到的難題。

第二輯第四分冊(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83)，頁 127-445。

⁷¹ 例如 1938 年上海學生生活社編了一部以抗戰為背景、主要由學生寫作的《抗戰的一日》；1940 年，上海聯合出版委員會又以徵文匯編的方式，出版《學校的一日》；分見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文學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下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頁 1085、1125。此外，《冀中一日》印行後，晉冀察邊區各地也紛起效尤，先後展開過《安平一日》、《保定一日》、《東鹿一日》、《徐水一日》等徵文活動，見張春寧，《中國報告文學史稿》，頁 222。

⁷² 張春寧，《中國報告文學史稿》，頁 137。

⁷³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pp. 21, 24.

他在作為該書前言的〈關於編輯的經過〉一文中，便已明白點出構成這部檔案性著作的四百餘篇日常生活敘事文本複雜、多樣的面貌：

真的，這裏是什麼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樂，飢餓線上掙扎的大眾，獻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後麻木的階層，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務員的腐化，土劣的橫暴，女性的被壓迫，小市民知識分子的徬徨，「受難者」的痛苦及其精神上的不屈服，……真的！從都市的大街和小巷，高樓和草棚，從小城鎮的冷落灰隘的市廛，從農村的斷垣破屋，從學校，從失業者的公寓，從軍營，從監獄，從公司公署，從工廠，從市場，從小商店，從家法森嚴的舊家庭——從中國的每一角落，發出了悲壯的吶喊，沉痛的聲訴，辛辣的詛咒，含淚的微笑，抑制著的然而沸湧的熱情，醉生夢死者的嚙語，宗教徒的欺騙，全無心肝者的狞笑！這是現中國一日的然而也不僅限於此一日的奇瑰的交響樂！⁷⁴

的確，在 5 月 21 日這一天被描述的日常生活經驗與事件中，充斥著城市與鄉村、匱乏與佚樂、壓迫與抵抗、奮鬥與惶惑、犧牲與背叛……種種難以數計的尖銳矛盾與巨大差異。

雖然，這些差異並不是任意滋蔓、不斷延異，絕無任何共通之處。社會學者 Georg Simmel(1858-1918)在論述日常生活中特殊性與整體性的辨證關係時，便強調我們雖不能把日常生活化約為一套系統、一種世界觀，但是，日常生活的片斷，也並不是彼此互不相干的孤立原子，我們仍能找到一套語言，編織出將其繫結起來的線縷，從而描繪出一個異質、多樣與繁複的整體。⁷⁵而茅盾所找到，用來結合日常生活之

⁷⁴ 茅盾，〈關於編輯的經過〉，頁 6-7。

⁷⁵ 引見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p. 38.

「歧異性與共通性」這兩個不同面向的，顯然是一套國族主義的修辭。如上文所述者，《中國的一日》中各種殊異的生活片斷，所共同譜成的，是一闕「現中國一日的然而也不僅限於此一日的奇瑰的交響樂」。換言之，這批日常生活檔案所再現出的紛雜多樣的獨特性與差異性，乃是被統攝在一個層次更高、範圍更廣的共同框架之內——那便是「中國」。

其實，從《中國的一日》的書名，我們已能察覺到，支配這部日常生活檔案、賦予其一套整體性意義的敘事主體，並不是那些具體的、孤立的個別作者，而是作為一個想像共同體的中國國族。從這部書所採取的編排形式與敘事系列，我們更能看到，這部書為形塑中國的國族認同，所建構出的特定空間與時間概念。

如上所述，《中國的一日》全書共分十八編，第一編便是摘錄各大報刊所載全國性重大消息與事件而成的「全國鳥瞰」，為其後諸篇提供了一個整體性的參照架構。⁷⁶接著便是全國政治中樞的南京(第二編)，以次則為上海(第三編)，再由華東的江蘇(第四編)、浙江(第五編)，轉入華中的江西、安徽(第六編)，湖北、湖南(第七編)，繼則北上以達北平、天津(第八編)，乃至河北、察綏等省(第九編)，兼及東北、冀北等「失去的土地」(第十編)，稍南而達山東、河南(第十一編)，復西向以入山西、陝西、甘肅(第十二編)，再折向東南的廣東、福建(第十三編)，偏西而歷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諸省(第十四編)，最後再附入國家主權延伸所及的海疆、空域(第十五編「陸·海·空」)，與國族成員離散寄寓的海外

⁷⁶ 這種編排方式也見諸「大眾觀察」先後出版的幾部生活敘事檔案。當然，如 Highmore 所指出者，這種編排形式，除為全書提供一個整體性的國族框架外，另一個更重要的功能，則在藉此凸顯官方及主流傳播媒體的敘事，與此後各編的日常生活敘事之間的重大落差與矛盾。見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pp. 85-86.

各地(第十六編「僑蹤」)。如此周行一過，勾勒出一塊範圍明確、界線清晰的地理體(geo-body)；⁷⁷而中國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踐行，自然也是被銘刻、鑲嵌在這樣的國族空間之中了。

另一方面，在中國的國族空間中布列(deploy)、開展的日常活動，其所遵循的時間序列，同樣也是一套國族化的時間圖式。茅盾曾在一篇導讀性的文章中，藉著與朋友討論該書內容的方式，指引讀者如何閱讀、理解這本書中形形色色、紛亂駁雜的生活經驗。他說：「這一日是平凡的。然而在我們中國，平凡下面就隱伏著特殊，所以你也可以不妨說這一本書全體是平凡而又特殊，特殊而仍似平凡。」⁷⁸就是這「平凡而又特殊」的一天中，在南京：

公務員忙著預習第二天受檢閱時的儀式，一位教官在逐項告誡，要那些公務員把耳朵後根擦乾淨，記住了自己手上有幾個「籬」，幾個「箕」。⁷⁹

在上海的一個角落裏：

有一位女中學生提心吊膽地在暗防她的破產的父親會自殺。⁸⁰同時，離上海不遠的松江佘山，正有一批虔誠的天主教徒，準備參加「聖主昇天節」的彌撒。⁸¹而在遙遠的北平：

⁷⁷ 關於「地理體」的概念及其與國族想像的關係，見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⁷⁸ 茅盾，〈被考問了《中國的一日》〉，頁 207。

⁷⁹ 茅盾，〈被考問了《中國的一日》〉，頁 207。參見黎民，〈訓話〉，《中國的一日》，第二編，頁 4-5。

⁸⁰ 茅盾，〈被考問了《中國的一日》〉，頁 207；參見姚霞，〈挨過了這一天〉，《中國的一日》，第三編，頁 43-45。

⁸¹ 茅盾，〈被考問了《中國的一日》〉，頁 207；參見嘉謨，〈五月廿一日的佘山〉，《中國的一日》，第四編，頁 62-63。

西北六十里的妙峰山下，正有一位全身紅衣，腳鐐手銬，三步一磕頭的還願女子，剛在走上山去。⁸²

同一天，在江蘇某「模範縣」的一所鄉村小學中：

一百八十多位小學生正因繳不出祝壽捐，開了個全體大會，提議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當這麼一毛八分錢。⁸³

也是同一時刻，福建省仙遊縣的四、五十名小學教師，正在罷教，並組成索薪團，向縣長追討積欠多月的薪資。⁸⁴

這一幕幕發生於不同地點，在性質上南轅北轍、迥不相同的日常生活事件，所以能夠拼貼、連綴，合為一體，並不是因為它們之間存在著任何邏輯性的因果關係，而是它們在日曆時間上的一致性(temporal coincidence)；它們之間的差異，因而也是一種「同時性」(simultaneity)的差異。這種由日曆與鐘錶所標定的「同時性」，其所蘊涵的時間概念，乃是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所說的一種「同質的、空洞的時間」(homogeneous, empty time)。Benedict Anderson 指出，國族想像所以可能的一項必要條件，正在於時間概念的改變。只有當「同質的、空洞的時間」取代了神聖性的「彌撒亞時間」(Messianic time)後，一個群體的不同成員才能被想像成會在任何特定的時點上，同時進行著穩定、匿名的活動，而且，他們也將不斷順著時間之流，持續地共同進行活動。因而，這種「同質的、空洞的時間」，正是一種國族的時間。⁸⁵《中

82 茅盾，〈被考問了《中國的一日》〉，頁 207；參見蔣恩鈿，〈妙峰山進香〉，《中國的一日》，第八編，頁 10-11。

83 茅盾，〈被考問了《中國的一日》〉，頁 207；參見白水，〈臨時全體大會〉，《中國的一日》，第四編，頁 49-50。

84 茅盾，〈被考問了《中國的一日》〉，頁 207；參見田青，〈罷教後的第三天〉，《中國的一日》，第十三編，頁 65-67。

85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pp. 24-26; 中譯文見吳叡人

國的一日》同樣也是憑藉著這套國族時間的網絡，來編織一幅「中國的人生」的總體圖像。

由是以觀，《中國的一日》確為 1930 年代中國的國族想像，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空間與時間架構。

不過，任何國族認同的打造與維繫，並不能只單純地寄託於一套抽象的時間與空間概念之上，它還需要國族成員無比強烈的感情投入。國族，作為一個認同的對象，與其他各種身分認同，如性別、階級等，最大的差異，正在於其足以激發出國族成員無怨無悔、生死以之的澎湃激情。法國詩人 Paul Valéry (1871-1945) 甚至認為，國族乃是無從計量，也不能以冷酷無情的理性手段加以釐清、界定的事物；它只能取決於其所具之「巨大的力量、狂熱的愛與信仰」，而這種神秘的魔力，將會把人們引向超越他們自身的不可知之處。⁸⁶ Valéry 這段話，或許過度誇大國族認同的心理要素，而忽略了其所兼具的社會面向，卻也有力地點出，感情與意義所構成的「內在環境」(internal environments)，在形塑國族認同上的重要作用。⁸⁷

1930 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進行中國國族想像的過程中，並未忽略這項重要的資源。1934 年，《新生》週刊主筆李平心 (1907-1966)

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99)，頁 28-30。

⁸⁶ 引見 Stephen Reicher and Nick Hopkins, *Self and Nation*, p. 4.

⁸⁷ 「內在環境」一詞借自社會學者 Alexander C. Jeffrey。Jeffrey 所鼓吹的文化社會學(cultural sociology)取向，特別強調由「感情與意義的視域」(horizon of affect and meaning)所構成之「內在環境」對人類社會行動的重要作用。這種「內在環境」乃是使得社會行動所以可能，同時又制限著社會行動之範圍的觀念資源，而社會結構(外在環境)的再生產與轉變，也都有賴於此。參見 Alexander C. Jeffrey, *The Meaning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2.

便用「中國人的心」一詞來指稱凝聚中國國族認同的感情紐帶。他指出，中國的國民，無論在分布空間、職業、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年齡差距上都有極大的歧異，但是，「我們卻都久已相識了」，因為「我們都有著一顆中國人的心」。正由於中國人都有這樣一顆「中國人的心」，才能像「共同生活著的家庭」一樣，「同禍福，同休戚，同榮辱，同甘苦」，結為一個強固的國族共同體。⁸⁸

但是，李平心這段話卻刻意規避與掩蔽了一個重要問題。他所謂「中國人的心」這樣一種特殊的「感覺結構」，並不是個人天賦自然、與生俱來的根基性秉賦，而是社會的與論述的建構性產物。⁸⁹李平心本人所使用的語言修辭，其實也正是此一建構過程的部分環節。

那麼，要透過怎樣的論述與文化實踐，才能有效動員國族成員對國族的感情投注呢？許多研究國族與國族主義的學者，大都強調，國族主義者往往利用對國族起源、語言文字、宗教信仰、歷史記憶，乃至地理疆域的特定論述策略與再現形式，來凝鑄社群成員對一個本真、獨特而崇高的國族共同體的認同與奉獻。在此意義下，國族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的形構(political formations)，更是一套 Stuart Hall 所謂的「文化再現的系統」(systems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⁹⁰

不過，除了對國族「本質」的文化再現之外，如何畫定國族邊界，

⁸⁸ 童恂齋(李平心)，〈給讀者們的第三封信——「中國人的心」〉，《新生》週刊(上海)，1：3(1934年2月24日)，頁52-53。

⁸⁹ Michael Billig, *Banal Nationalism*, p. 18; Ruth Wodak, Rudolf de Cillia, Martin Reisigl and Karin Liebhart eds., trans. by Angelika Hirsch and Richard Mitten,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4.

⁹⁰ Stuart Hall,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Stuart Hall, David Held, Don Hubert and Kenneth Thompson eds.,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and Oxford: Polity, 1995), p. 612.

區隔國族的內部與外部、分辨國族的成員與非成員，更是國族建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關鍵。人類學者 Frederik Barth 甚至認為，造成一個族群團體的決定性因素，不在該群體所具有的血統、語言、宗教等文化內涵，而是取決於一條分隔內外的「邊界」。族群成員的文化特質可以改變，整個群體的組織形式也可以重新編組，但是，這條畫分「我群」與「他群」的界線，卻絕不可少；它乃是族群維持與延續的生命線。⁹¹由此而論，界定國族的判準，主要並非國族內部的性質，而是國族的外部。易言之，只有把國族從其他國族或族群團體區分出來後，才能有效地凝聚出國族成員對國族的認同與歸屬感。因而，國族的存在，事實上仰賴於與之相對立的「他者」。國族認同，便是經由「他者」的作用與影響，來自我界定與再界定。而在這些「他者」中，那些「重要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關鍵性角色。所謂「重要的他者」，意指地理位置上與國族毗鄰，互動頻繁，卻對國族持敵對態勢，從而嚴重威脅(或被認為是威脅)到國族之生存的其他國族或族群團體。心理學者 Anna Triandafyllidou 即以希臘與馬其頓共和國的衝突為例，指出：每個國族在任何時刻，都會面對一個真實的或想像的「重要的他者」，並藉此來形構或改變其自身的認同。⁹² Linda Colley 研究十八、十九世紀英國的國族打造過程，也特別強調與英倫三島隔海相望的法國，作為一個敵對性他者，在搏塑不列顛國族認同上的重要作用。⁹³

⁹¹ Frede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Frede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Bergen: Universitetsforlaget, 1969), pp. 14-15.

⁹² Anna Triandafyllidou,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ther,'"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1:4 (July, 1998), pp. 593-612.

⁹³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國的一日》同樣也是通過一個鏡像式的「重要的他者」，來凝聚中國社會大眾的國族認同。在當時的中國，這個「重要的他者」，無疑就是日本。

如前所述，1930年代中期，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日亟，不斷擴張其政治、軍事勢力，使中國面臨存亡絕續的嚴重危機。而遍布中國各地之日本駐軍經常性的武裝演習與其包底下的大規模走私、販毒活動，更令一般社會大眾，在日常生活的領域中，直接感受到這群敵對性他者的切身威脅。《中國的一日》書中，便處處洋溢著市井小民與此一國族他者相遭逢時，所引發的驚惶、憤恨與敵愾之情。上海一位小市民5月21日晚上與朋友聚餐飲酒後，在回家路上，遇到正在進行巷戰演習的日軍；在刺刀的脅迫下，飽受驚嚇，只得鵠立巷口，仔細「鑑賞了『皇軍』的那種『如入無人之境』的英勇氣勢」。⁹⁴一位流落北平的東北青年，則在車站月臺碰見一名護路的日本憲兵：

……這個頭真不小！平常的中國人都沒有他高，大紅帽緣底下露出黑黃的面孔，皮肉長的真結實，眼神很利害，從頭頂上到腳跟底下，沒有一絲一毫的和氣地方。我的眼神和他的眼神打了一個照面，心裏立刻起了一個冷戰。……我躊躇著，竭力鎮靜自己，不叫自己的憤怒的神氣，和他的目光接近。⁹⁵

同日，山西太原一名中學國文教員，看到天空飛過一架機翼上漆著紅色太陽的「友邦」飛機，也不由心中「感到鉛一樣的沉重，壓迫」。⁹⁶

在這種強烈的感情投射下，《中國的一日》書中所描述的日本人，往往都不再是具體存在的個人，而是被抽象化、類型化(stereotype)為充滿惡意，絕無可能彼此溝通、相互肯認的絕對性「他者」——一種本

⁹⁴ 清芬，〈酒後〉，《中國的一日》，第三編，頁25。

⁹⁵ Y cheng ze，〈文化城的一日〉，《中國的一日》，第八編，頁7-8。

⁹⁶ 麗雲，〈一頁日記〉，《中國的一日》，第十二編，頁6。

體論意義上的「敵人」。上文所引日本憲兵的形象，便已透露此中消息，而上海一位鐵路警察的生活自述，更把這種心理轉折表現得淋漓盡致。這名路警在值勤時，碰到一對帶著一名幼兒的日本夫妻，這個小孩十分活潑可愛，不但成為眾人矚目的對象，連這位路警也對他「發生無限的愛慕」，不覺和孩子的父親攀談起來，但是，

我低下頭，正想同他談話，忽然看到他那雖然不高，然而非常雄壯的身體，猙獰的面孔，及兩道使人看不慣的粗眉，處處都可以表現出他內心的狡詐！……看見他種種的舉動，不由得使我腦筋內，回想起許多的悲痛事件：如朝鮮之亡、廿一條、東北四省、一二八、偽滿洲國、塘沽協定、華北問題，及現在當局無法制止的全國普遍走私！他國外交上的口頭禪，是「親善！親善！」大概上頂的事件，就是表示所謂「中日親善」吧。我恐怕他對待我太親善了，所以我便不再開口。⁹⁷

然而，在南京政府忍讓妥協的不抵抗政策束縛下，《中國的一日》的作者群，面對這些橫暴恣肆的絕對「他者」時，更常感受到的，卻是因無力抗拒所造成的屈辱、挫敗與愧疚等複雜情緒。北平一位青年與朋友赴中山公園賞花途中，看到一群中國士兵列隊朝車站前進，一面高唱著「滿江紅」的雄壯歌曲，恰好車站上正運送來一批日本軍隊，一時之間，「大家的心都變得緊張了，所有的觀眾的臉孔都顯出另一種表情來」。不料，就在這一觸即發的緊張時刻：

好像一個提琴名手一下子從高音轉到低音似的，嘹亮的歌聲立刻跌落了，變得懦弱而模糊……

這位青年與他的朋友，也只好「懷著一種不可形容的情緒」，絕望地

⁹⁷ 吳鈞，〈我今天的日記〉，《中國的一日》，第三編，頁14-15。

擠出人群，繼續向目的地進發。⁹⁸天津一批中學生聽到學校當局被迫訂閱了一份日人所辦的《盛京時報》，激忿之餘，在公民課上群起要求教師說明原委。這位老師卻一味搪塞，顧左右而言他，「同學們按著忿氣，只是瞪圓了眼睛直視著地板」。這時，遠處斷斷續續傳來日軍打靶的槍聲，「擊碎了每個偷安懦弱的死心」。⁹⁹

對於那些處在日人勢力直接控制地區的中國民眾來說，這種感受自然格外尖銳。冀東某中學的學生在上「本國史」的課程時，一上課，老師就要學生拿出墨筆，把教科書中所有敘述日本侵華事蹟的章節全部添註「刪去」二字。記述此事的學生，在他投寄《中國的一日》的文章中，便這樣形容個人的感受：

刪去這——似割掉我們自己身上的肉，當我們不得不寫「刪去」

的時候，那枝手中的墨筆，似一把尖銳的刀刺入我們的心頭！¹⁰⁰

另一名留學日本的廣東青年男子，偕同鄉女同學赴東京遊覽，卻因女同學被誤認為日本人，致遭日本警察拘留盤查，大受屈辱。回到宿舍後，與同舍滿洲同學談起各自的遭遇，「兩個人默默地對坐著，像有一大堆膠布塞住喉頭」。滿洲同學離去後，

我又呆呆地望著天空，縈念著那遼遠雲外的故國。但恍惚還有一串聲音在耳畔響道：「你們算好呢！還可說是中國人！」我

的眼淚無力地滴下了。¹⁰¹

社會心理學家指出，國族主義的修辭，往往隱含著強烈的愧疚感與恥辱感。¹⁰²石靜遠也認為，屈辱感與挫敗感在近代中國國族想像過

98 王西稔，〈賞花記〉，《中國的一日》，第八編，頁 27-28。

99 大戈，〈中學生日記〉，《中國的一日》，第八編，頁 41。

100 劉士引，〈永不能忘記的一課〉，《中國的一日》，第十編，頁 12-13。

101 陳琳，〈五月二十一日的事〉，《中國的一日》，第十六編，頁 14-16。

102 T. J. Scheff, *Bloody Revenge: Nationalism, War and Emotion* (Boulder, CO:

程中發揮過關鍵性的作用。這種由外化的愧恨之情所造成的受難感 (victimhood)，不但是近代中國文學的重要母題，也為中國的國族認同提供了強大的心理動力與必要的修辭策略。在這種特殊的文化心理浸潤下，個人的苦難與欲望，深深烙印著對國族命運的悲憤與憂思。近代中國的國族主體，便是由這種創傷性的恥辱感召喚而成。因而，對苦難與屈辱的沉溺，往往更能激發出強烈的國族主義情緒，以及對集體未來一種理想性的憧憬。¹⁰³從《中國的一日》的相關生活敘事中，我們也能清楚看到這樣的心理變化歷程。那位在北平車站月臺躊躇徘徊，壓抑著滿腔憤懣的青年，最終便是以這樣的豪情壯志來自我淬礪：

……我們難道就甘心作亡國奴了嗎？我們難道就甘心被人家偷偷地給賣了？偷偷地給定了賣身文書？我們好像是在黑暗的曠野裏，周圍有許多的狼，對著我們嚎叫，不拿出身上的武器，那個狼肯後退！掏出一根火柴來罷！點起曠野的荒草來罷！讓一星星的火亮變作幾萬萬星星的火亮！讓野火燒退了狼群，讓野火肅清了整個骯髒的世界。¹⁰⁴

那名被迫刪改教科書的冀東學生，則是一面滴著淚水，一面在紙上寫下他為國家民族犧牲奉獻的決心：「國家垂危，實不容緩！既是國家之一份子，當要極力救國！」¹⁰⁵

從這些環繞著「重要的他者」而開展的生活敘事中，《中國的一日》所召喚出的，正是對中國國族的熱切認同。就此而言，《中國的一日》，或許猶如 Fredric Jameson 對第三世界文學所作的極具爭議性

Westview Press, 1995); cited from Michael Billig, *Banal Nationalism*, p. 101.

¹⁰³ Jing Tsu,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¹⁰⁴ Y cheng ze, 〈文化城的一日〉，頁 9。

¹⁰⁵ 劉士引，〈永不能忘記的一課〉，頁 13。

的論斷，可說是一套不折不扣的「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¹⁰⁶

四、「人民的聲音」——《中國的一日》中的階級與國族

《中國的一日》進行徵稿活動時，繫獄南京的陳獨秀(1879-1942)也應邀寫了一篇短文。傾心於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陳獨秀，相當敏銳地注意到「中國的一日」這項標題所蘊含的國族主義取向；因而，他那篇短文全未涉及個人的生活狀況，而是對這個题目的意識形態意涵，提出嚴厲的批判與告誡。他說：

……在階級的社會裏，一個國際主義者的頭腦中所謂世界，只有兩個橫斷的世界，沒有整個的世界；在這兩個橫斷的世界之鬥爭中，若有人企圖把所謂整個的世界這一抽象觀念，來掩蓋兩個橫斷的世界之存在，而和緩其鬥爭，這是反動的觀點，……在一個國家中，也是這樣，也只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橫斷的社會之存在，抽象的整個國家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人相信這利害取舍根本不同的橫斷世界及橫斷社會，可以合作，可以一致，這不是痴子，便是騙子。¹⁰⁷

在陳獨秀看來，階級與國族這兩種認同範疇，相互對立，絕無並存的可能。他這段話也反映出，在 1930 年代中國知識階層關於中國未來出路的思考與討論中，階級與國族這兩個概念糾結纏繞的緊張關係。

¹⁰⁶ 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1986), pp. 65-88. 對 Jameson 此一觀點的批駁，見 Aijaz Ahmad, "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 *Social Text*, 17 (1987), pp. 3-25.

¹⁰⁷ 陳獨秀，〈中國的一日〉，《中國的一日》，第二編，頁 II：31-32。

其實，無論「國族」抑或「階級」，都並不是一種內涵固定、界線明確的實體(entity)。社會學者 Pierre Bourdieu 便極力反對關於「階級」的「實體主義」式的解釋。他認為，在現實社會生活中，階級並不是靠一套確定的客觀判準來界定，而是一種關係性的建構；亦即是經由對什麼是「社會世界及其內部區分之合法觀點」的鬥爭，而建構出來的一種身分認同。¹⁰⁸至於「國族」，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更是恆常處於不斷被(再)詮釋、(再)發現與(再)建構的過程。人類學者 Renato Rosaldo 便對 Anderson 的理論提出過重要的補充。他強調，把國族界定為「想像的共同體」，並不是問題的結束，反而是更多問題的開端。如果國族真的是想像的產物，我們當然必須追問：是誰在想像？是通過怎樣的文化策略來進行想像？不同的想像方式又會造成怎樣不同的結果與影響？¹⁰⁹ Michael Billig 也清楚地點出「國族」作為各方勢力競逐對象的特質。他說：「不同的群體，不管是階級、宗教、地域、性別，還是族群，總是不斷地在角逐為國族代言的權力，並努力把他們自己的聲音呈現為國族整體的聲音。」¹¹⁰因而，接受國族主義召喚的主體，雖然都懷抱著熱烈的國族主義激情，卻未必對國族的內涵及其界線，有著相同的看法。¹¹¹換句話說，國族主義政治過程中，真正重要的，並不是對「國族」本身的質疑，而是對國族的性

¹⁰⁸ David Swartz, *Culture &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p. 147-148.

¹⁰⁹ Renato Rosaldo, "Others of invention: ethnicity and its discontents," *Voice Literal Supplement*, p. 27, cited from Ana Maria Alonso, "The Politics of Space, Time and Substance: State Formati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3 (1994), p. 392.

¹¹⁰ Michael Billig, *Banal Nationalism*, p. 71.

¹¹¹ Jing Tsu,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p. 23.

質、範圍及其合法代表者的爭議。

從這樣的觀點而論，階級與國族這兩個認同範疇，自非如陳獨秀所指，此疆彼界，壁壘分明，絕無相互滲透、調適的可能。事實上，在馬克思主義長遠而複雜的思想傳統中，固然可以找到以「工人無祖國」為標榜的世界主義取向，卻也能夠發現一套把勞動無產階級視為國族「本真性」(authenticity)之代表的國族主義預設。¹¹²因而，對鄒韜奮及其周遭的中國左翼知識分子來說，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像陳獨秀所諄諄告誡的那樣，要在階級與國族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最終決斷，而是如何建構一套論述，來有效地綜攝二者。他們所提出的，便是一種代表「人民的聲音」，以工農基層社會大眾為主要成員，具有強烈階級意涵的國族論述。1935年底，一位化名「景觀」的作者發表了一篇討論「愛國」的文章。他指出，所謂「國家」，不過是「大眾生活的集團」，國家可愛的地方，就在於能夠保障大眾的生活，增進大眾的福利；所以，「真正能夠愛國、知道愛國的，只有那些勤勞大眾」。¹¹³因「新生事件」¹¹⁴而身繫囹圄的《新生》週刊主編杜重遠，則在一篇

¹¹² 馬克思主義與國族主義的關係，是一個非常複雜、聚訟紛紜的問題，相關論著為數繁多，最近一部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法國為主題的歷史學研究，參見 Robert Stuart, *Marx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Socialism,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during the French Fin de Siècl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關於中國共產革命運動與國族主義的糾葛，參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98)，下冊，頁 962-974。

¹¹³ 景觀，〈愛國論〉，《大眾生活》，1：1，頁 8-9。

¹¹⁴ 1935 年 5 月 4 日，杜重遠主編的《新生》週刊登載了易水(艾寒松)所寫的〈閒話皇帝〉一文，略謂日本昭和天皇並無實權，故以搜集植物標本為日常工作。不料此文引起日本政府強烈抗議，認係侮辱天皇。在日方壓力下，南京國民政府藉口該文違反圖書審查條例，判處杜重遠 1 年 2 個月徒刑，並查封《新生》週刊，是為「新生事件」。見《生活書店史稿》，頁 46-47。

回應性的短文中，明白闡釋出該文未曾正面表述的論點：「中國是中國大眾的中國；我們也許還可以說，中國應該是中國大眾的中國，或可以說，我們應該努力使中國成為中國大眾的中國。」¹¹⁵稍後於此，另一位署名「簡博」的左派知識分子，更進一步將這種立場表達得十分顯豁。他認為，所謂「愛國」、「救國」，所認同的是「民族的利益」，而非「統治機關」的利益。在推動救國運動時，「勞苦大眾」的利益，是和「民族利益」相一致的。因而，「只有勞苦大眾積極的參加救國運動，成為救國運動中最英勇堅決的首幹，救國運動才會得到全盤的最後勝利」。¹¹⁶《中國的一日》的作者們，大體便是遵循著這樣的論述策略。

一般說來，主動響應《中國的一日》徵稿活動的作者，大抵都是思想比較激進，既熱切於抗日救亡的愛國運動，更同情於社會主義理想的「進步青年」。¹¹⁷他們對於中國社會現實中貧富懸殊的狀況極為不滿，也對落實公義、平等諸價值的社會改造，抱持著高度的憧憬與期望。一位上海香煙製造廠的會計，便對該廠高層職員假公濟私、肆意糜費，所耗餐飲旅行等開銷動輒數十百元，而長時間在高溫廠房辛苦勞動的工人，不幸悶死後，卻只得到區區 5 元收殮費的尖銳對比，

¹¹⁵ 杜重遠，〈愛誰的國〉，《大眾生活》，1：3（1935 年 11 月 30 日），頁 78。

¹¹⁶ 簡博，〈要救國！〉，《生活日報》，1936 年 7 月 2 日，七版。

¹¹⁷ 化名「辛不留」，在《中國的一日》書中發表〈北平的一日〉一文的朱邁先，便是一個典型的例證。朱邁先（1918-1951）為知名作家朱自清長子，當時就學於北平崇德中學，在政治上極為活躍，曾參與 1935 年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並於 1936 年秘密加入共產黨。其後投身國民黨軍隊，從事抗日宣傳與統戰活動。中共政權成立後，在「鎮反」運動中，以「匪特」罪名遭槍決，至 1984 年始告昭雪平反。參見〈「鎮反」中被判死刑的朱自清長子〉，《安徽歷史文化論壇》，<http://bbs.ahage.net/thread-52632-1-6.html>。

深表憤慨。¹¹⁸南京一名小學教員，班上有一些貧苦學生，因無制服可穿，無法參加全國教具玩具展覽會的參觀活動，卻又違反老師的囑咐，不肯打掃教室。這位教師在了解了他們受挫而委屈的感覺後，感慨地勉勵這些小孩：「不要悲哀！和你們一樣的享不到幸福的孩子多著，然而你們的國度終有一天到來呵！」¹¹⁹

這種強烈的社會關懷，使得《中國的一日》作者群對中國大眾日常生活中普遍的貧困與痛苦，極為敏感，這也是該書著墨最多、刻劃最深的主題。在這些作者對自身與周遭人物生活狀況的觀察與記述中，無論城市、鄉村，舉凡處於社會下層的工廠工人、商店職員、學徒、農民，乃至窮苦學生、小學教員與小公務員、軍警人等，幾乎都共同處於朝不保夕，為維持基本生存而奮力掙扎的悲慘境遇，其甚者，乃至失業流離，淪為流民、乞丐，輾轉溝壑，不知死所。上海一名綢廠工人便因廠方長期以來僅發給半額工資，以致生活無以為繼，「家人們整整二十四小時沒有一粒米下過肚子」。¹²⁰江蘇一所鄉村單級小學中，一位幾經艱難才覓得職缺的青年包辦了上自校長下至工役的所有校務，名義上月薪 20 元，實則四個月間，只領到區區 8 元。幾度斷炊之餘，只得把棉被送進當舖，卻又在當舖巧遇同樣來典質衣物的鄰村初小校長：

我們兩人走出門來，擠在一塊走，擠得很緊，默默地走著，好像彼此間有什麼聯繫似的，整個的心腔，都給一種淒切的感覺包圍著，我們的眼睛裏，都漾動著辛酸的淚水。¹²¹

118 華蕊，〈在香煙製造廠裏〉，《中國的一日》，第三編，頁 80-81。

119 憶淵，〈孩子們！等待著你們的國度吧！〉，《中國的一日》，第二編，頁 14-15。

120 林嵐，〈一個綢廠工人的日記〉，《中國的一日》，第三編，頁 75。

121 白燕，〈鞭笞〉，《中國的一日》，第四編，頁 64-66。

山東濟南一位督學下鄉視察鄉村小學辦理狀況，卻發現好幾所短期小學根本湊不齊半數學生，許多學童都在街頭討飯，送到河邊供強迫勞役的家人充飢。這位督學「看見那一個個焦黃的臉，一叢叢的蓬頭垢髮，一雙雙瘦子般的小腳」，不由一陣戰慄：「這一群饑餓的孩子，是應該讀書嗎？」¹²²河南鄭州一個軍校學生在道路測圖的實習課上，看到路旁麥田邊上有個小女孩，蹲著身子，正在拔草，一問之下才知道，這草是拿來吃的；這位軍校生不禁想起自己的妹妹，「又想起了窮家鄉，心裏好難受」。¹²³四川重慶一位作者回農村老家，聽說無地貧農平常都靠山坡上挖出的「觀音米」（白坭）果腹，而且，「每天去挖那傢伙的，至少一處都有七八百人，不精靈的等到天黑都不容易候著輪子」。¹²⁴成都一名大學生在寫給父親的家書中，也轉錄法院的審判書，報告了一樁發生在川北農村的吃人案件：三名婦人原本靠揸柴賣菜度日，不期年成不好，家人陸續餓死，最後連草都沒得吃，只得盜掘屍首，析骸為炊，前後共吃掉六個人。這位大學生在信中激動地向他曾任法官的父親提出這樣的質疑：「你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呢？你將如何判他們的罪呢？你願這現實腐朽下去嗎？」¹²⁵

正如成都這位大學生的反應，《中國的一日》的作者們在身歷或耳聞社會大眾現實生活中種種慘絕人寰、陰鬱黑暗的事件後，不會不進一步思考造成這些悲慘圖景的原因，也不會不去追索徹底改變現況的途徑。但是，他們並沒有因而響應陳獨秀的號召，走上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道路；這些黑暗、悲慘的生活現象，反而更強化了他們國族主義的熱情。在他們看來，中國基層民眾生活中普遍遭遇到的苦難與

122 黎侶，〈「這碗飯真不易啊」〉，《中國的一日》，第十一編，頁 10-11。

123 辛彬，〈我的五月二十一日〉，《中國的一日》，第十一編，頁 39。

124 平東，〈鄉里一日〉，《中國的一日》，第十四編，頁 34。

125 趙其賢，〈一日間〉，《中國的一日》，第十四編，頁 26-27。

危機，正是國族外部的「他者」——日本帝國主義所直接造成的結果。

許多《中國的一日》的作者都認為，日本的軍事與經濟侵略，乃是斲害中國國族之生存與發展，導致中國工商凋敝、民生困苦的禍源厲階。寧波一位紗廠職員便說，他供職的紗廠，「這幾年來是一直走上了一個悲慘的命運，棧房裏是成千成萬賣不出去的紗，橫在老闆們面前的是金融週轉的嚴重困難的問題」，以致工廠不時被迫停工，工人和職員的生活陷入絕境。¹²⁶冀東玉田縣一位青年在致友人的信函中也指出，該縣本為棉布產區，賴布業為生者不下數萬人，自從逃稅的走私日貨大量入境傾銷以來，該地的織布工業無力競爭，完全破產，加以水旱為災，連年歉收，關外糧食又在日人統制下，無從輸入，致使糧價飛漲，農民生活苦不堪言，已到走投無路的地步，因而，搶糧風潮接踵而生。¹²⁷另據山東周村的一位作者調查，該鎮一日之間輸入之走私日本人造絲便達 220 箱，加上原有積壓於各商行的存貨，總數高達九千箱，該鎮凍結在此項貨物的金錢，便將近二百萬元，以致金融緊縮，百業萎靡。¹²⁸

猖獗的走私問題而外，日本在華北各地販賣毒品、開設賭局的行徑，更被《中國的一日》的作者們視為直接戕害中國社會大眾正常生活的罪惡淵藪。一位冀東青年在向離鄉友人報告家鄉的近況時，便指出，在「敵人加緊進攻剝削之下」，其家鄉的廣大農村地區中，即便是窮鄉僻壤的小村落，也都紛紛設立了洋行和賭局，以致「每個勤苦的青年，甚至大半的中年和婦女，都被引誘得吸毒狂賭。荒蕪了他們的田園，犧牲了他們的工作」。整個農村因而急遽地趨向破滅，人民大眾的生存更

126 洪嘉絢，〈一封滿是牢騷的信〉，《中國的一日》，第五編，頁 33。

127 亦民，〈一封來信〉，《中國的一日》，第十編，頁 11。

128 允哉，〈周村的一日〉，《中國的一日》，第十一編，頁 18。

陷於絕境，造成普遍不安的混亂局面。¹²⁹一名在天津求學的青年返回東北營口的故鄉時，舉目所見，「竟是異常的黑暗、淒涼、蕭條」；當地街頭的牆上貼滿販售鴉片、白麵的廣告，馬路上也不時發生日本浪人強迫農民買賣毒品的事件，農民大眾終日「生活在驚怖、飢寒、壓迫中」，郊外野地中也「增加了許多的野哭與新墓」。¹³⁰

就此而言，《中國的一日》的作者群，其實並不反對國家統一、主權獨立的國族主義立場。不過，他們也沒有完全忽略陳獨秀的告誡：並沒有一個「抽象的、整體的」中國。他們認為，國族外部敵對「他者」對中國社會大眾的侵凌與迫害，還得到國族內部許多邪惡勢力的推波助瀾。這便是與日本帝國主義狼狽為奸，肆意剝削中國民眾的漢奸、資本家、土豪劣紳與軍閥、官僚等人群。他們所構成的，便是一批缺乏「中國人的心」的國族內部的「他者」。

在《中國的一日》的相關敘事中，這些國族內部「他者」唯利是圖，毫無國家民族意識可言；他們為虎作倀，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勾結，更如雪上加霜，增添了一般民眾生活的艱辛與痛苦。徐州一位中學教師報導當地的社會狀況，便指出，徐州漢奸活動頻繁，兩三天內就有一、二十名貧苦青年受其利誘，被拐騙到天津或滿洲國去；一些蠅營狗苟，汲汲於私利的商人也爭相搶購日本私貨，數百噸的白糖，短短期間便被爭買一空。這位教員因而感慨地說道：「要商人也愛國，真像把駱駝從針孔裏拉過去一樣的困難了。」¹³¹張家口一個小公務員也指出，當地往返察北的長途汽車行，是由「中國同胞」開設，卻僱用日本浪人擔任保鏢，橫行無忌，抗納一切捐稅。¹³²上海一名紗

129 莊夢光，〈冀東的民生〉，《中國的一日》，第十編，頁 5-6。

130 孟威，〈東北來的一封信〉，《中國的一日》，第十編，頁 4-5。

131 楊逸波，〈徐州雜碎〉，《中國的一日》，第四編，頁 97。

132 黃冰，〈塞外的一日〉，《中國的一日》，第九編，頁 26。

廠工人更根據親身經歷，對資本家假愛國之名，行剝削之實的行徑，提出嚴厲的控訴。他工作的華商紗廠中，工人的勞動時間，最早是實施「六進六出」制，每班工作 12 小時，此後陸續延長，到 1935 年時，已增加到每班 16 小時。而廠方增加工時的口實，則是強調日紗削價傾銷，華紗無力競爭，因而要求工人發揮「反日愛國」的精神，協助資方降低成本，共度難關。全廠千餘名工人，一方面為「愛國行動」之美名所誘，一方面又受到「關廠失業」的脅迫，只得勉強應允，從而更加深了勞工的「牛馬奴隸化」。¹³³

同樣的，中國農村地區的農民大眾，除了日本帝國主義直接、間接的壓迫外，也還受到各類土豪劣紳等「封建勢力」的殘酷侵剝。冀東玉田縣那位青年分析民眾對於日人控制下「自治」局面的反應，便強調，當地的豪紳地主與出身此一階層的部分知識分子，為保護本身的財產和地位，不但俯首貼耳，「甘心當帝國主義的孝子順孫」，更憑藉敵人勢力，肆意欺壓本國民眾，「有時他們的手段，比他們的主子還厲害呢」！¹³⁴一位山西太原的作者，也敘述了該地紳商地主利用剿共軍隊徵調給養的時機，大事囤積居奇，以致糧價高漲，貧苦農民無以為生的苦況。¹³⁵寄自陝西鳳翔的一篇文章，更極意刻劃出不肖地主經營高利貸，盤剝農民，甚至強索債款，擄人作抵，因而逼出人命的橫暴行徑。¹³⁶

既然中國社會大眾所受苦難的根本禍源，主要來自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資本家、土豪劣紳等內外兩股勢力裡應外合、彼此勾結的侵略與壓迫，許多《中國的一日》的作者不免都認為，挽救國族危機的

133 方根寶，〈一個紗廠工人的話〉，《中國的一日》，第三編，頁 76-77。

134 亦民，〈一封來信〉，《中國的一日》，第十編，頁 12。

135 懷，〈柳村的一日〉，《中國的一日》，第十二編，頁 9-10。

136 侯培森，〈討債〉，《中國的一日》，第十二編，頁 34-35。

唯一道路，只能是努力喚起一般大眾的民族意識，團結動員，共挽狂瀾。兩位合力撰文的杭州高中學生便強調，要根本解決嚴重的農村問題，只靠局部的改良，緩不濟急，「應該立刻發動一個神聖的民族解放鬥爭，驅逐出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勢力，並根本剷除封建餘孽」，然後才能運用教育和經濟的手段，按部就班，逐步挽救沒落的農村。¹³⁷無錫一名織布廠的低級職員，也深覺，在「外受日帝國主義的積極侵略」，「內受封建思想和地主、土豪劣紳、資本家的壓迫」下，「國難愈深，民間的疾苦更甚」；因而，中國人民大眾正確的努力方向，乃是「在外抗強暴、內清壓榨的目標之下，聯合國內外的被壓迫者和平等待我的民族，站在一條戰線上，共同奮鬥」。¹³⁸

在這樣的論述策略下，《中國的一日》的作者們所想像出的中國國族，毋寧是一個由工農大眾等處於社會底層的廣大人羣，以及與此階層站在同一陣線的愛國小知識分子所構成的政治共同體。在此一共同體中，階級界線與國族界線彼此疊合，從而排拒了資本家、地主豪紳與軍閥、官僚等特定社會群體參與國族生活的可能。這種國族想像方式，當然與國民黨政權以國家為中心的整體性國族論述南轅北轍，鑿枘難入。因而，《中國的一日》的作者們所再現出的底層民眾生活狀況，雖然在表面上與新生活運動者所指斥的「野蠻、非人的鬼生活」並無二致，他們卻無法接受將中國社會的病灶歸因於傳統道德淪喪的論述方式；他們對南京當局枝枝節節的瑣碎改革措施，也都抱持著懷疑與拒斥的態度。江蘇泰縣一位小學教師，便引錄了一封貧苦學生的信件，藉以對「新生活運動」捨本逐末、不切實際的作法，表達其強烈的不滿。這個學童在課堂上聽到老師講述日常生活中衛生習慣的重

137 吳士源、繆夏榮，〈在杭高〉，《中國的一日》，第五編，頁 6-7。

138 同，〈生活剪影和一些感想〉，《中國的一日》，第四編，頁 42。

要性後，回家便向父母要求改善居家環境。但是，對這個連維持基本生存都極為艱難的家庭來說，這些要求根本無從實現；這名學童也才明白：只有那些有錢人家的孩子才配得上談「衛生」，像他那樣的窮人家小孩，是「沒有資格談衛生的」。¹³⁹蘇州一名失業青年在出門告貸的途中，望著滿街隨處可見的新生活運動標語：「鈕要扣好」、「要漱口洗頭」、「手要洗乾淨」、「行路不要吃東西」等等，也不由嘲諷地想道：「飯也快沒有吃了，還背它做甚？」¹⁴⁰

另一方面，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在積極備戰的口號下，於各地大規模推展的修路築堡等工程，更成為《中國的一日》的作者極力抨擊譏諷的對象。如前所述，《中國的一日》書中第一編收錄了5月21日全國各大報刊登載的國內外重要消息。在這個代表官方觀點的欄目中，鐵、公路的交通建設，不但被視作「剿匪」軍事得以順利進行的關鍵因素，更被宣傳為減輕人民負擔、保障地方安全的重要措施。¹⁴¹然而，《中國的一日》的作者群，在實地觀察一般社會大眾的感受與反應後，卻對這些建設作出迥然不同的評價。他們認為，政府一味退讓妥協，遲遲不願將抗日口號付諸實際行動；因而，道路與碉堡的修築，非但不能發揮應有的功能，反而平白佔用了大批貧苦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田產，更加深了基層民眾生活的負擔與痛苦。尤有甚者，這些工程徵用民地、調派勞役的過程，又往往為地方官僚與豪強土劣提供了上下其手、魚肉小民的良機；影響所及，甚至將基層民眾原有的些微國家民族意識摧殘殆盡。宜興一位小知識分子拒絕了當地甲長以錢代工的提議，親自參加開河挖泥的「勞動服役」，卻發現這項名義上標榜全民共同擔負的義務，「完全和一般養尊處優的人脫離關係！

139 曼流，〈退回來的禮物〉，《中國的一日》，第四編，頁85-87。

140 王知更，〈五月念一日的觀感〉，《中國的一日》，第四編，頁22-23。

141 〈全國交通事業的發展〉，《中國的一日》，第一編，頁7。

『服役』的人，大都還是終年『勞動』者」。¹⁴²無錫一名作者，也記述了當地農村三萬多名農民在軍政當局以抗日國防工事為名的號令下，「舞動鐵耙，把自己的麥田慢慢的開成大路」的情景。在鄉長與士兵的監視下，這些農民只能俯首貼耳地做著苦工，稍有違抗，動輒慘遭毒打，以致人群之間不斷傳出「日本人來了也不過如此」的咒罵之聲。因而，在這位作者筆下，南京政府大肆宣揚的「國防」大道，真正象徵的，並不是萬眾一心，一致抗敵的國族主義熱情，而是「千萬人的汗水，千萬人的咀罵，千萬人的怨恨」。¹⁴³

從這種角度觀察，《中國的一日》之所以和異時異地的英國「大眾觀察」，不謀而合地採取把主流媒體的全國性新聞報導放在全書之首，這樣一種獨特的編排形式，並不只是單純的巧合，而毋寧更有著共通的、極具政治作用的意涵。事實上，「大眾觀察」的相關出版物，所以一律採用這種編排方式，目的正在藉以凸顯代表權力集團之利益的主流傳媒所刻意營造的整體性意象，實與社會大眾分歧多樣的日常生活經驗，存在著極大的落差。¹⁴⁴同樣的，《中國的一日》所以作此編輯安排，也正是要透過官方的宣傳論述與底層民眾實際生活狀況之間的巨大反差與尖銳對比，來傳達出後者一向被掩蔽著、被壓抑掉的低微聲音——一種「人民的聲音」。

不過，我們或許應該繼續追問：《中國的一日》藉由一套高度階級化的國族敘事，所試圖再現的「人民的聲音」，究竟是誰的聲音？

「屬民研究群」(subaltern studies group)的重要學者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曾經針對底層民眾是否可能發出自己的聲音，提出過深刻的質

¹⁴² 鮑雨，〈一頁日記〉，《中國的一日》，第四編，頁 70-71。

¹⁴³ 沈天羽，〈徵工築路第四天〉，《中國的一日》，第四編，頁 46-47。

¹⁴⁴ Ben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pp. 85-86.

疑。¹⁴⁵學界對「大眾觀察」運動的研究也指出，該計畫原本企圖讓一般英國中產階級與下層的勞工階級，都能有各自發出不同聲音的機會；然而，其實際結果卻是教師、圖書館員、店職員、學生與家庭主婦等下層中產階級的成員，幾乎壟斷了所有的聲音，工人階層則依然還是沒有聲音的弱勢群體。¹⁴⁶從以上所引述的諸多文本，我們也可看出，《中國的一日》對工農大眾生活狀況的敘述，絕大多數仍是出自學生、教師、店職員、小公務員等小知識分子的手筆。事實上，在 1930 年代中國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廣大的工農群眾極度缺乏最基本的經濟與文化資本；¹⁴⁷他們縱使知道《中國的一日》的徵稿活動，恐怕也無暇、無力執筆書寫自身的生活經驗與感受。廣西南寧一名中學教師，便已意識到這一點。他在赴校上課路上，一面構思打算投寄《中國的一日》的文稿，一面看著身邊走過的「一個個挑糞的婦人和一群群苦力」，不由聯想起：「『中國的一日』的徵求，於她們有什麼呢？」¹⁴⁸

就此角度而論，中國社會的底層群眾，畢竟不是能夠自我表述的主體，而只能是被表述的客體。因而，《中國的一日》所標榜的「人民的聲音」，究其實質，也只能是一些邊緣性知識分子，基於特定的意識形態立場，假「人民」之名所發出的聲音。

弔詭的是，在《中國的一日》經由大量日常生活敘事所建構出的

¹⁴⁵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271-313.

¹⁴⁶ Dorothy Sheridan, Brian Street and David Bloome, *Writing Ourselves*, p. 33.

¹⁴⁷ 據上文引述的那位成都大學生的調查，1936 年成都人口共 480,596 人，其中有業者 321,598 人，無業者 154,172 人；識字者 213,378 人，文盲 262,439 人。成都尚且如此，內地農村之狀況，可想而知。見趙其賢，〈一日間〉，頁 27。

¹⁴⁸ 周健，〈南寧半日記〉，《中國的一日》，第十四編，頁 3。

國族論述中，這群沒有聲音的「人民」大眾，雖然被賦予中國國族構成主體的優越地位，被當作是抗敵救亡的國族計畫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力量，卻同時也被認為是中國國族裏資格尚未完備的半成員，也是有待國族教化、規訓與改造的客體。《中國的一日》的作者們便經常驚詫地發現一般工農大眾、小商販，並不像他們所期望的那樣，洋溢著愛國、救國的國族主義熱情。南京一名青年紀錄了一段推銷員與雜貨店老闆的對話，這名推銷員以極為優惠的條件，說服店主違反政府禁令，答應代銷東洋仁丹。¹⁴⁹河南郊縣的茶館中，也有幾名茶客在議論時局之餘，得出如此的結論：「這年頭，誰來我們是誰的老百姓。」¹⁵⁰廣州一位作者則在赴沙面辦事途中，目睹一群中國小販談笑風生地走進當地日人所設走私機關。¹⁵¹河北保定一個臥病在床的作者，更對一般市井小民麻木不仁，毫無國家民族意識的表現，極為痛心。他從窗外望見日本軍機在保定上空盤旋，

可是馬路上的行人卻仍嬉皮笑臉的看著玩，沒有半點憂鬱的表情，我不覺滴下兩道熱淚來，不知是苦還是酸。¹⁵²

中國社會的底層大眾何以如此欠缺與國族命運休戚與共的感情連繫？可以想見，《中國的一日》的許多作者，大抵都將之歸咎於物質生活的貧乏與艱困。正是由於生計拮据，這些工農商販才不得不接受國族敵人的威迫利誘；也是由於貧窮所造成的無知，才使他們對國家民族的前途視同胡越，漠不關心。此外，愚昧、自私、迷信等根深柢固的「封建」習性，更被《中國的一日》的作者們認為是阻礙社會大眾徹底覺醒，肯認自身與國族群體真正利益的主要癥結。《中國的

149 江風，〈仁丹〉，《中國的一日》，第二編，頁 25-26。

150 馬祥雲，〈郊縣一日印象記〉，《中國的一日》，第十一編，頁 50。

151 秦衛，〈沙面一瞥〉，《中國的一日》，第十三編，頁 4。

152 田嬰，〈窗外隨錄〉，《中國的一日》，第九編，頁 3。

一日》便有多篇文章記述一般民眾沉溺於宗教「迷信」的情景。鎮江一位作者到城隍廟參觀，看到「無數的『消災求福』的人們虔誠的縮著一團跪在偶像面前」，又想到別的廟裏同時還有許多「灰色的生命在那裏蠢蠢的動著」，不由「感到有點惘然了」。¹⁵³徐州那名中學教師也描述了轟動當地的「活神仙」替人治病的經過。這個穿著僧服的「活神仙」，號稱手摸口吹，即能醫治百病；這位教師看過之後，忍不住「肚子都笑痛了」。然而，求治的民眾卻是前擁後繼，為數極多，致使這位教師也不免為之「大惑不解」。¹⁵⁴來自河南的一篇投稿，則刻劃了鄭州廟會中許多農村婦女為了給「眼光爺」燒香，不惜縮衣節食，傾囊施捨的愚昧行徑。¹⁵⁵

在《中國的一日》的作者看來，基層民眾這種「無知固執」的表現，正反映著中國社會中「時代的逆流到處泛濫，封建的餘威到處充塞」，亟需以文明的力量，加以全盤改造。江蘇一位鄉村小學的校長，便是以這樣的一段話來自我期許：「在這烏煙瘴氣的社會中，到處都正須我們努力啦！我們要抱著摸黑路求長進的態度，去度過一層一層的難關，將古舊的農村改建造一個合理的意境啊！」¹⁵⁶

經由這樣一套對大眾日常生活的敘事，《中國的一日》事實上不自覺地與他們所極力抨擊的新生活運動，建立了一種隱晦的共謀關係。他們雖然堅決反對新生活運動者對中國大眾日常生活中各項弊病的解釋框架與解決策略，然而，他們卻與新文化運動者同樣預設了一套在歷史過程中，與資本主義體制相偕共生，並以理性、進步為主要表徵的現代性諸價值。從這種角度來說，《中國的一日》的作者們，

153 陳迹，〈這一日的寺廟〉，《中國的一日》，第四編，頁 4-5。

154 楊逸波，〈徐州雜碎〉，《中國的一日》，第四編，頁 97。

155 石珀，〈鄭州的眼光廟會〉，《中國的一日》，第十一編，頁 53-54。

156 董澄宇，〈鄉村小學教員生活之一頁〉，《中國的一日》，第四編，頁 88-89。

縱使百般拒斥資本主義所宰制的經濟與社會體制，卻依然擁抱著 Slavoj Žižek 所謂的「沒有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¹⁵⁷

從「沒有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價值預設出發，在《中國的一日》所建構出的國族想像中，一般工農大眾只能處於國族內部文明階序中的從屬性位置，並接受國族代言者持續不斷的領導、教化與啓蒙。因而，《中國的一日》中對工農大眾日常生活的敘事，不僅是一套召喚國族主體的論述策略，更是敘事者用以樹立、鞏固其文化霸權的意識形態裝置。上海一群「進步」學生在向貧苦的人力車夫進行愛國宣傳，得到熱烈回應後，便十分樂觀地說道：

勞苦大眾的生活雖然惡劣，教育雖然幼稚，但並不像賣國求榮、欺蒙民眾者所宣傳的一樣。他們並不愚昧，他們並不懦弱，他們並不消極。反之，他們是一群頭腦清醒、積極勇敢的戰士。在適當的組織和領導之下，他們將為解放民族、改造社會的先鋒隊。¹⁵⁸

在這個過程中，這群「進步青年」雖然扯下了國民黨政權「新生活運動」替「人民」大眾日常生活披上的意識形態面紗，卻同時又為其蒙上了另一套意識形態的面紗。

那麼，在 1930 年代中國，「人民的聲音」到底在那裡？我們無從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或許只能說：「人民」，正如「國族」、「階級」一樣，都不過是在特定權力關係下，經由各種不同的敘事與論述，

¹⁵⁷ Žižek 所謂「沒有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m)，意指消除了社會階級區隔的資本主義體制。引見 Harry Harootunian, *History's Disquiet*, p. 52.

¹⁵⁸ 上中社會科學研究會，〈讀者之聲——貧民窟內〉，《永生》，1：8(1936年4月25日)，頁199。

被建構出來的象徵性產物。¹⁵⁹

五、結語

1930年代的中國，面臨著內憂外患的殷重危機，國族主義的情緒隨之極度高漲。這種強烈的感情，不僅成為支配中國社會公共論述與行動的關鍵因素，也滲透進一般大眾日常生活各項食衣住行的例行性活動之中，不斷地召喚、形塑著一批批新生的國族主體。《中國的一日》中兩位杭州高中學生記述其參加升旗典禮的經過，便發為如下感想：

在號聲嘹亮之下，我們那美麗的國旗當著八百隻舉著致敬的手，洋洋地爬上了旗桿的頂梢。但不知有幾多腦袋，當這霎那間曾經想到了：就在我們這個國度裏，已有大片的土地上，看不見這漂亮的國旗了！¹⁶⁰

另一名張家口的小公務員，出城登高，遠眺周遭景色，但見一片「滔滔的濁流，蔚藍的遠山，無窮的碧落，山光水色，水聲雲影」，不由慨然感嘆：

啊，大好河山，只是山河不改，人事日非了！¹⁶¹

一如 Michael Billig「平庸的國族主義」所指出者，1930年代中國的國族認同，便是在這些日常生活中細微而零散的經驗與感覺中，持續地被再生產、再發現與再確認。

然而，正因日常生活乃是凝聚國族認同的重要場域，1930年代中

¹⁵⁹ 關於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人民」概念，可參見 Canovan 簡要而精闢的討論，見 Margaret Canovan, *The People* (Cambridge: Polity, 2005).

¹⁶⁰ 吳士源、繆夏榮，〈在杭高〉，頁 6。

¹⁶¹ 黃冰，〈塞外的一日〉，《中國的一日》，第九編，頁 27。

國各個角逐著國族領導霸權的權力集團，自然也不免要對這個場域，進行著對抗性的攘奪與競爭。這些意識形態南轅北轍、實際利益迥然不同的政治團體，面對中國社會動盪擾攘、民眾生活貧困艱窘的現實狀況，相率提出各類不同敘事，來解釋社會大眾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苦難，並指示出個人與群體的未來出路及奮鬥方向。因而，當時中國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猶如 Henri Lefebvre 所言，乃是被包裹在一層由當下生活經驗與意識形態力量所混雜而成的硬殼之中，其中既有經濟的現實，也混雜著政治上層結構的運作，更蘊涵著革命性的政治意識。¹⁶²

1930 年代，南京國民黨政權所推展的新生活運動用來打造這層外殼的手段，便是一套將社會大眾日常生活加以「醜怪化」的敘事策略。在這套敘事中，中國民眾深深陷溺於「非人的」、「野蠻的」生活境遇，而其根本癥結則在於「禮義廉恥」等傳統道德精神的淪喪；因而，振救之道，端在經由國家對人民生活各項細節的嚴密規訓與監督，重振「國魂」，進而凝聚成一個「軍事化」、「生產化」的整體性國族。換言之，這種日常生活敘事最終蘄向的，乃是一個以威權國家為主體的中國國族想像。

相對於國民黨政權特定的國族想像，以上海為中心的左派知識群體，也在 1930 年代中期，通過一場「大眾觀察」式的社會文化運動，匯聚了一批散處全國各地，以邊緣性小知識分子為主要成員的「大眾」，來對中國基層社會的生活樣貌，進行直接的觀察與分析，從而產生了一部近代中國日常生活的檔案性文本——《中國的一日》。

從《中國的一日》雜沓多元的喧嘩聲中，我們大致可以拼湊出一套與新生活運動針鋒相對的抗制性日常生活敘事。根據這套敘事，中

¹⁶²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I: Introduction, p. 56.

國社會大眾生活中所遭遇的悲慘命運，與傳統「國魂」之存亡毫無瓜葛，而主要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軍閥、土豪劣紳、資本家這兩類分處國族內外的「他者」，對中國人民的侵略與壓迫所造成。因而，惟有聯合勞苦大眾，發動大規模民族解放鬥爭，「外抗強暴，內清壓榨」，重建一個平等合理的社會體制，才能挽救國族的危機，也才能將中國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導入正軌。這樣的日常生活敘事，所建構的，則是一種以「人民大眾」為主體，把國族界線與階級界線疊合為一的中國國族想像。

雖然，不論是新生活運動國家化的國族想像，抑或是《中國的一日》階級化的國族想像，我們都無法從中聽到中國「人民」真正的聲音。在雙方表面上的重大差異之下，新生活運動者與《中國的一日》的作者群，事實上共同擁抱著一套以進步、理性、效率為表徵的現代性價值。因而，不管是被貶抑為國族的客體，還是被高揚成國族的主體，中國的「人民」大眾永遠都只能是掌握著國族詮釋權力的代言者規訓、教化的目標。

由是以論，1930年代中國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並不只是一塊充斥著各類習焉不察的生活慣行，被社會的自覺意識排拒在外的模糊空間。它毋寧乃是各種知識權威凝視、論述、評斷的「殖民」對象，同時更是各種權力、利益與意識形態進行動員，相互爭持、對抗與協商的政治場域。

然而，如同 Michel de Certeau 所再三強調者，正因日常生活多元、雜亂、零散的獨特性質，它不可能被任何外在力量全面殖民，社會世界也無法經由任何宏大敘事來緊密縫合(suture)。¹⁶³《中國的一日》的

¹⁶³ Mark Poster, *Cultur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ty: Disciplinary Readings and Challeng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25.

編寫，雖然一開始便定下一套以國族為敘事主體的總體框架，許多參與書寫的作者也都高度自覺地將 1936 年 5 月 21 日那一天個人的時間、思想與感情，毫無保留地奉獻給這件「表現一天之內的中國的全般面目」的偉大事業；¹⁶⁴但是，這部巨大的中國社會日常生活檔案，依然不時迸濺出若干異質性的因素，流動著許多不在國族宰制範圍之內的生活碎片：一位從事地下革命活動的青年，所描寫的是他對其組織對象產生單戀情愫的窘態；¹⁶⁵另一位慈愛的母親則敘述了她為幼子慶生的歡樂景象。¹⁶⁶

既然連深深烙刻著「國族」印痕的 5 月 21 日當天，都無從擺脫各類雜音的干擾；那麼，時過境遷，5 月 21 日這一天消逝之後，《中國的一日》的作者們是否還能念茲在茲、心無旁騖地繼續進行著國族想像的艱鉅工程，而不把他們的注意力轉移到現實生活中無可避免的柴米油鹽、喜怒哀樂，乃至偶然邂逅的路旁小花、天際雲彩？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中國的一日》所艱辛打造出的「中國」，或許也只能是「一日的中國」吧。

（本文於 2008 年 11 月 17 日通過刊登）

校對：黃怡君

¹⁶⁴ 《中國的一日》書中便有多處反覆自我提醒「不要忘記了今天是『中國的一日』」，例見許炳榮，〈我之一日〉，《中國的一日》，第二編，頁 13；朱今，〈代考〉，《中國的一日》，第三編，頁 53；冀馬，〈但願能擺下你的書桌〉，《中國的一日》，第十編，頁 2；杜子勁，〈開封一瞥〉，《中國的一日》，第十一編，頁 35-36。

¹⁶⁵ 茂材，〈我恨自己〉，《中國的一日》，第八編，頁 30-31。

¹⁶⁶ 劉恆，〈長真生日〉，《中國的一日》，第六編，頁 2-3。

One Day in China or China in One Day: Everyday Life Narrativ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Nationhood in 1930s China

Sung-chiao She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It is conventional wisdom for scholars doing research on the topics of nation and nationalism to give privileged emphasis to the effects of particular extraordinary events such as revolutions, wars, and mass movemen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By contrast, the role that everyday life has played in this process is quite often unduly overlooked. However, thanks to the forceful argument that Michael Billig proposes in his seminal book *Banal Nationalism*, we are rightly reminded that the power of nationalism lies not so much in its occasional spectacular manifestations as in the way that we presuppose nationhood in talking about the mundane phenomena which constitute our everyday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 idea of nationhood is regularly flagged in our routine practices and everyday discourses. Through this kind of flagging, our nations are reproduced as nations, with our citizenries being unmindfully reminded of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China was facing a serious national crisis due to the threat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the 1930s. In order to mobilize popular zeal for the defense of Chinese nation, the constituent details of Chinese people's daily life

were put under the scrutiny of the governing elites and the nationalist intellectuals. Everyday life became the site for contests and negotiations among different national projects proposed by antagonistic power blocs. In 1936, a group of left-wing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edited and published a voluminous book entitled *One Day in China*. No less than 480 authors contributed their pieces for this Chinese “Mass Observation” project, recording what they experienced and thought on the day of May 21. Focusing on this archive of the everyday life, this article delineat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its production, traces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it employed,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imagined Chinese nationhood constructed through this text.

Keywords: imagination of nationhood, everyday life narrative, one day in China, 1930s China